

让服务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鲜明主题

任 屏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十八大着眼于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这是新形势下指导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文件。《意见》突出强调,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引领基层党建工作,使服务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主题,推动基层党组织在强化服务中更好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为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需要基层党组织奋发有为,凝聚共同奋斗的强大正能量。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许多改革发展稳定举措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引导基层党组织把服务作为自觉追求和基本职责,把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行动,带领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正是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和群众期盼的有力之举,也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广大基层党组织要紧紧围绕这个新定位新要求,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作风,提高服务能力,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领路人。

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核心在服务,重点在建设,根本在群众满意。各领域基层党组织职责任务不一样,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服务是共性要求,向服务转型是紧迫任务。基于此,《意见》提出了“五个服务”内涵和“六有”建设目标,明确了强化服务功能、健全组织体系、建设骨干队伍、创新服务载体、构建服务格局5项具体创建任务。这些新部署新任务,以服务为主线,理念更鲜明、职责更明晰、评价更聚焦,是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总体要求。贯彻这些要求和部署,结合各自实际大胆探索实践,我们就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离不开的“家”。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最需要“落地生根”。各级党委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树立问题导向,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关心支持基层,帮助基层解决困难和问题;抓住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契机,集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我们深信,随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基层党组织必将建设成为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将持续增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必将不断巩固。

(摘自201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江苏省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
江苏省政工专业资格评定办公室

主办

编辑出版:《大众学堂》编辑部
(内部资料、赠阅·总第33期)
电 话:88802751
邮 编:210013
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0号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五楼
电子邮箱:jssjst@163.com
承 印: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准印证号:苏准印JS-S001号
出版日期:2014年6月20日

主 编 双传学
副主编 公永刚
顾建萍
责任编辑 王俊翔
美术编辑、封面设计 樊音纳

大众学堂

DA ZHONG XUE TANG



卷首语

让服务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鲜明主题 任 屏



特别策划(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 4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
共有精神家园 许 俊
- 7 正确认识和把握政策问题的五对关系 舒国增
- 10 做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 陆治原
- 13 弘扬焦裕禄精神谱写中国梦
江苏篇章 张加华等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15 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 胡和平
- 17 强化民本理念, 践行群众路线 陈震宁
- 19 新时期群众工作应突出四大要素 吴朝武
- 21 红军长征与党的群众路线 连海大



中心组学习

- 24 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 周银超
- 26 做好干部工作应从三个层面发问 曹 勇



江苏讲坛

- 29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必然要求 李德顺

目 录

contents

热点透视

- 33 中国经济总量,年内世界第一? 朱剑红
36 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赢得事业 慎海雄
38 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 王东京
40 广东重拳治理千余“裸官” 王 华
41 从严治吏背景下的官员六种心态 袁 静

基层经验

- 44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幅绚丽图画
..... 韩晓华 吴如彬 王 军

环球视线

- 47 向新加坡借鉴什么 黄 靖
49 贪欲和傲慢催生腐败 廖政军

文史钩沉

- 50 思辨之宗,大道之源 冯立鳌
52 弘扬“义以为上”的传统美德 李翔海

大众时评

- 54 阅读丢失了什么 陈应松
55 “官不聊生”错在哪 润 革
57 4G时代能否少些宽带式忽悠 汤嘉琛

党史纵横

- 58 十大元帅传奇入党历程 尹家民

文摘荟萃(集锦六则)



(2014年第3期 总第33期)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 共有精神家园

许俊

编者按: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国家,确立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编者转发此文,以飨读者。

核心价值观是精神支柱,是行动向导,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精神家园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思想基地、奋发进取的动力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当代中国人共有精神家园,巩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中国人心中一直珍藏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并为之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观为主导构筑当代中国人共有精神家园。

从国际形势来看,我国和平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迫切需要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始终倡导并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甚至不惜制造事端、设置障碍,千方百计压缩我国发展空间,扰乱我国发展进程,企图按其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改造我国。只有努力构筑中国人共有精神家园,用先进价值理念与世界对话,用中国梦诠释我国和平发展对世界的重大贡献,用包括民族凝聚力在内的国家软实力应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冲击与干扰,才能更加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东方。

从国内情况来看,破解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增强发展动力,迫切需要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当前,我国发展既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关键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思想观念、心理结构发生深刻改变,社会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分化格局。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精神家园的呵护与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导致一些人信仰迷失、诚信缺失,影响

特别策划(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到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消除“成长中的苦恼”,亟需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力量,形成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与基础

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内容与构建基础,历来与时代使命、传统文化、发展环境息息相关。当代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其共有精神家园也必然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与基础。

共有精神家园应体现当代中国发展要求。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必须体现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要求,满足个人发展、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相统一的需要,满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需要,让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实现中国梦和实现个人梦有机结合的强大精神支柱,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共有精神家园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的精神标识,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其中的爱国明志、厚仁守节、自强好学、贵和尚勇、诚信奉公、勤俭务实等传统美德,是人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结晶,理所当然要成为共有精神家园的基因、养分。我们构筑的共有精神家园,应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思想精髓,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使民族文化血脉得以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共有精神家园应包含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构筑的共有精神家园既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又要增强我国进行国际交流合作时的亲和力;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本质要求,又要最大限度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对待域外文明,既不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也不能傲慢偏执、简单拒斥。应以宽阔的胸怀加强交流互鉴,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用中外文化的精髓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让人们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概括和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体现了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总体价值诉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谋求全面进步的基本价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构成了中国人的道德形象。这三个层面24个字,既有中国人民世代梦想与追求的生活境界和社会环境,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底线与人格要求,还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价值观上的具象化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合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奋斗目标、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实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价值认同与精神追求的高度统一,是构筑当代中国人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与基础。

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突出实践要求,分类设计、分层实施,把社会主义核心

特别策划(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价值观融入共有精神家园,使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

坚持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培育共同理想,为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二是深化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党史国史、国情世情、国家核心利益与共同价值目标等主题教育,把中国道路、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三是提供圆梦舞台。从关注人们的价值实现入手,协调好国家利益需求与国民利益诉求的关系,让人们在实现国家价值目标过程中实现个人目标,在追求中国梦过程中实现个人梦。

坚持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引领改革实践,给共有精神家园增添时代内涵。一是正确引导社会利益关系调整。以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作为利益关系的最佳平衡点和最大交汇点,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既描绘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和美好愿景,又阐释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和复杂过程,凝聚全社会最大共识。二是积极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尤其是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形成机制、规范有序的权力运行机制、通畅快捷的民意表达机制、高效务实的便民服务机制,推动各级政府把主要职能和精力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上来。三是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社会价值取向融入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导入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有机统一起来。

坚持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规范道德行为,让共有精神家园凝聚社会正能量。一是做大做强正面宣传。这是把个人层面价值准则内化为个人心理认同的有效方

式,也是提振精气神、传播正能量的主渠道。应着力提高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不仅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主阵地作用,还要综合运用网络媒体、文学艺术、公益广告等各类资源以及重大纪念日、主题活动等各种载体,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宣传实效。二是抓紧抓好示范引领。善于发现、深度挖掘并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宣传报道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感人事迹,让真、善、美的道德风尚和社会正气始终成为社会生活主流和人们心头暖流,成为人们的精神依靠和品行追求。三是落实落细实践养成。道德追求重在实践,道德行为贵在养成。应广泛深入开展适合不同行业 and 不同群体特点的群众性道德实践和文明创建活动,坚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从家庭生活抓起、从社会规范抓起,把道德养成贯穿于人们成长的各个环节,引导人们守住法律底线,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激发人们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四是建立健全政策保障。发挥法规政策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完善激励、保障和约束机制,对各行各业的道德模范给予关心和爱护,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为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正确认识和把握政策问题的五对关系

舒国增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深刻指出:“在学习理解上,要防止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这一重要论述,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更好地开展政策研究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正确认识 and 把握好政策问题的这五对重大关系,才能切实提高政策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正确认识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找准政策的“关节点”

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实质上是政策范畴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两者相互依赖,互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既要立足于整体,追求系统整体的最佳效应,又要注意各个局部的特点,重视和发挥具体政策的积极作用,切实找准政策“关节点”,做到局部服从整体、整体关照局部,避免整体政策与具体政策相脱节。

坚持系统研究与结构分析相结合,是找准政策“关节点”的基本方法。系统性是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系统研究就是从事物的全局出发,在系统、子系统、单元、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把握系统整体的本质和规律,追求整体目标的优化。结构分析就是把系统分解为一组相关联的子系统,并在整体的指导下协调各个子系统的目标,通过求局部最优化得到的解而达到整体的最优解。比如,当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率十一届省委作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就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科学把握省情特点基础上作出的整体政策安排,涵盖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既是浙江推进科学发展的总部署,也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谋划,由此形成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总抓手。

坚持宏观指导与微观操作相统一,是找准政策“关节点”的基本原则。一项好的政策,应当兼具指导性和操作性,既能从全局高度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战略问题,又能从微观角度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化解产能过剩就是这样一个兼具指导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安排。从宏观指导上看,化解产能过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适度大于需求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但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超过有效需求时,

将会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2012年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化解产能过剩的实质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从微观操作上看,化解产能过剩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抓得住、能见效、好推动,便于考核、督促和检查。做好这项工作,不仅可以有效解决企业经营困难、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而且有利于从长远推进企业发展,增加企业职工收入。

正确认识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确定政策的“突破口”

系统政策链条是相关政策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所形成的链条式政策形态。构成系统政策链条的各个政策环节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应加强政策相关性分析,充分注意同在一个范畴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政策目标和政策举措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对政策执行效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确定政策的“突破口”。

实现政策突破,须科学设计政策链各政策环节之间的链接方式,找准系统政策链条的“激活码”。政策链条是政策环节相互黏合的有机统一体。政策环节链接紧密,就能形成“1+1>2”的政策累加效应,起到综合治理的效果;政策环节链接松散或脱节,则必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难治本。提高政策环节链接紧密度,关键是找准“激活码”,把各个相互独立的政策环环相扣,紧密黏合在一起并有效激活起来。

实现政策突破,须把握政策环节内部

节点之间的交叉对接点,力求具体政策“无缝焊接”。每一个政策环节都是相关具体政策的集合,而每一项具体政策又是用来规范某些主体行为的准则。这些主体行为之间的利益有时是相悖的,这就需要强化政策内部节点的有效对接,确保政策目标一致、政策措施协调。

正确认识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紧抓政策的“结合部”

政策是由自上而下多个层次组成的宏大体系。政策总体设计既包括政策顶层设计,也包括政策分层对接。其中,政策顶层设计是战略性设计,解决的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政策分层对接是战术性设计,解决的是把顶层设计付诸实践的具体问题。搞政策研究,应善于运用层次分析法,明确政策问题中所包含的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将各因子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通过对各层次因子的比较分析,将不同政策方案按重要性或适用性排列,作出不同层次政策最优方案的选择。

根据区域特点抓好政策对接。我国采取的是渐进性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是政策设计的重要方法,许多政策出台往往遵循地方试点—总结经验—全面推开的步骤。各地应当顺应中央的政策意图,积极争取把实践探索上升到国家层面,努力取得国家有关方面的支持,为政策顶层设计提供实践经验,推动政策顶层设计落到实处。比如,近年来,海南国际旅游岛、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山东黄河三角洲地区、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福建海西经济区、广东南沙前海横琴新区及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相继得到国务院批复,2013年国务院又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国家

特别策划(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战略举措”不仅引领着各省(区、市)新一轮改革发展,而且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根据职能权限抓好政策对接。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政策权限。政策对接应当按照规定界限进行,该中央统一安排的地方不能抢跑,该试点的地方不能仓促面上推开,该先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能超前推进。同时,该尽早推进的也不能拖延,该结合实际的地方不能完全照搬照套。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并明确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实行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等要求。中央的总体部署明确后,省一级就要抓紧出台施工方案,按照施工方案推进各项举措落地。

正确认识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寻求政策的“公约数”

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政策是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的总目标而确定的行动准则,是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因此,政策必须具有普遍约束力,这是政策统一性的表现。同时也要看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还不平衡,必须防止简单的“一刀切”。

坚持在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是寻求政策“公约数”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加强对政策的环境分析,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心理环境等分析,确定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并作出因时、因地、因人的判断,以便在政策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中做到异中求同。以推进新型城市化为例。比如,对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政策统一性要求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各地在贯彻落实这项政策过程中,综合考虑各自的地理结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因素,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化模式。

正确认识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把握政策的“渐进性”

研究政策要有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今天的政策是昨天政策的延续,明天的政策又是今天政策的发展。任何一项政策都是时代的产物。实践发展没有止境,政策创新永远在路上。搞政策研究,不仅要科学把握当前的情况,而且要预测前瞻发展的趋势,还应该深入分析历史的轨迹,研究前后政策之间的联系,理清该项政策的历史沿革和总体脉络,提出现阶段的政策目标和政策举措,做到既不脱离历史,又不落后时代。

把握政策的“渐进性”,就要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古人云,政贵为恒,治须有常。一项好的政策制定后,就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同时,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对原有政策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切实做到稳定性、连续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紧紧围绕“三步走”战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定相应的政策目标和政策举措。2002年,党的十六大根据“三步走”战略已胜利实现前两步目标的实际,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



做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

陆治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一个鲜明观点,就是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要求党员干部要有强烈的实干担当意识。通过认真系统深入的学习,我对党员干部“敢于担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敢于担当的内涵

十八大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中,多次使用“担当”这一概念。他上任后不久,在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这么说过:“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他又强调:“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

勇于承担责任。”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强调,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今年2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布里廖夫的专访,谈到执政理念时,明确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他用14个字概括了他的执政理念,这个理念很能反映他的品格、作风,也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什么是担当?往大了说,就是一种责任感或者使命意识;往小了说,就是要不怕

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步走”战略基础上,郑重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政策设计,充分体现了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接力奋斗的决心和与时俱进的精神。

把握政策的“渐进性”,还要蹄疾步稳、急而不躁。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既不能止步,也不能速成。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制定政

策时,必须善于把握形势,充分考虑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既不能犯急躁病,也不能当尾巴,切实做到蹄疾步稳。蹄疾,就是要有一种紧迫感,不待扬鞭自奋蹄,努力提高政策研究的超前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在战略上勇于进取。步稳,就是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把握事物特点,遵循客观规律,坚持问题导向,掌握好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一个一个地克服困难,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在战术上稳扎稳打。

(摘自2014年6月9日《学习时报》)

特别策划(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困难、能担事。

习近平同志总是把理想与担当紧紧连在一起,强调“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他本人的责任意识就特别强。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郑重宣示: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刚刚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又郑重宣示: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习近平同志不仅要求自己,也要求广大干部要有担当精神。早在2010年,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他就说过:“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在去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特别强调了理想信念和敢于担当这两条,认为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他说:“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他引用古语说:“‘为官避事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概括了好干部的标准:“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五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敢于担当。这样的概括在我们党的文献中,是很少见的。那么怎样才是敢于担当呢?习近平同志是这样说的:“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

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我理解,这五个面对,就是敢于担当的具体标准。

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

培养敢于担当的干部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不以票取人。习近平同志也多次说:“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他还说:“不能求全责备,一有失误就加以责难,这样会挫伤干部敢于担当、勤奋工作的积极性。决不能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不干比干更得利的导向。”

在实践中,领导干部敢于担当,必然触动一些人的“奶酪”,讲一些得罪人的话,做一些得罪人的事,由此有可能受到误解和非议。如果组织上不撑腰,谁还会做敢于担当的人,谁还敢做需要担当的事。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旗帜鲜明地支持担当者、保护担当者、褒奖担当者,为那些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撑腰鼓劲,使敢于担当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使勇担当、敢作为在干部队伍中蔚然成风。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就要有激励敢于担当的选人用人机制。选什么

特别策划(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人、用什么人,是重要的风向标和指挥棒。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什么样的人 是贤人?标准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就要求我们把敢于担当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注重选用那些在重大是非面前敢于坚持真理的人,选用那些在困难矛盾面前敢于担责负责的人,选用那些解决问题有思路有办法的人,选用那些开拓局面卓有成效的人。通过强化正确用人导向,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那些有锐气、勇作为、敢担当的干部得到重用,让那些日常工作不负责任、关键时刻畏首畏尾的人受到警醒。

在领导干部中弘扬敢于担当的精神,需要领导干部自身加强修养,也需要良好氛围的支撑。进一步健全严肃的党内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大力倡导讲原则、敢负责、勇担当的良好风气。把担当精神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日常教学之中,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解决当干部为什么要担当、怎样担当的问题,增强敢于担

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营造担当可贵、担当光荣的社会氛围,大力宣传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动真碰硬的好干部,宣传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的好干部,宣传心系群众、爱民敬民、不计个人得失的好干部,让全社会向他们致敬、为他们喝彩,推动形成鼓励担当、崇尚担当的良好环境。

最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重新修订印发。这个修订也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要求,在总则中专门加上了“敢于担当”的要求。应该说,现在担当已经成为了一种品德,一种精神,一种风尚,一种价值尺度。

总之,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一名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就是要牢固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自觉担当起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直面难题、直面困难,敢抓敢管、敢闯敢干,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组织、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作者系榆林市人民政府市长)



弘扬焦裕禄精神谱写中国梦

江苏篇章

张加华 周延胜 周忠丽 王 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导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搞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遵循。在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梦江苏篇章的进程中,江苏要继续走在前列、作出表率,就必须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

弘扬焦裕禄精神,解决联系服务人民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焦裕禄的可贵在于真正把党的事业当做生命,把为人民服务当做职业操守,始终与老百姓心相连、情相依,同呼吸、共命运,始终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母、诚心诚意当人民公仆。

要秉持公仆情怀,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公仆情怀说到底就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人民公仆”这个简单而朴素的表述,高度概括了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定位。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权为民所赋”问题。在江苏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时刻提醒自己“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树立公仆意识,摆正自己与群众的位置。不论在什么岗位,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群众放在心坎上。

要秉持公仆情怀,强化宗旨意识。省委书记罗志军同志在镇江考察调研时称赞句容的为民致富带头人赵亚夫淡泊名利,



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可见“公仆”二字说起来简单,是

否当得起“公仆”却并不容易,它考验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守,宗旨意识是否坚定。

要秉持公仆情怀,多办利民之事。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这些话朴实真挚,生动体现了他对党的宗旨意识的执着。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条件艰苦、矛盾集中、困难突出的地方,尽力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好事。

弘扬焦裕禄精神,做出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焦裕禄同志就是凡事探求就里,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吃别人啃过的馍。这种尊重群众、尊重客观规律的求实作风,也生动体现了他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遵循。

要笃行求实作风,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从实际出发,只有真正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发现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才能用科学的方法开展顶层设计,遵循客观规律全面深化改革。

要笃行求实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江苏正处在结构转型阵痛期、转型升级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各项工作的开展比以往任何时期更离不开重调查研究

特别策划(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

的实事求是作风。“三解三促”创新了当前新形势下求真务实的有效途径,其作为一种“活动”有时间限度,但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常性工作。

要笃行求实作风,追求实实在在的政绩。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保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好的蓝图干到底。坚决反对光讲空话,不干实事,反对弄虚作假、作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历史检验的实绩。

弘扬焦裕禄精神,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

焦裕禄的道德情操集中体现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

要常修道德情操,做到艰苦朴素。焦裕禄以自己的言行,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现在和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区域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我们没有理由奢侈浪费。必须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保持健康、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

要常修道德情操,坚决抵制特权。不搞特殊化,就是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要特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常修道德情操,严守党纪党规。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江苏省委也制定了十项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纪律意识,自觉落实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坚持清正廉洁不含糊,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弘扬焦裕禄精神,开创全面深化改革

新局面

习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学习焦裕禄“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出焦裕禄奋斗精神的本质特征。

要永葆奋斗精神,做知难而进的勇者。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较早。焦裕禄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激励我们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自觉保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不怕矛盾复杂、不怕任务艰巨、不怕责任重大,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奋斗激情,争创科学发展一流业绩。

要永葆奋斗精神,提升改革的自觉性。面对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必须以改革统领全局,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回应人民群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期待,从最急迫的事项改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要突出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大重点”,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江苏特点的改革创新之路。

要永葆奋斗精神,做敢于担当的模范。焦裕禄同志在面对兰考自然灾害的肆虐和贫困落后的实际,一开始就立下雄心壮志:“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他得知自己病情很重时还豪迈地说:“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生动体现了他对事业和责任的担当。面对繁重而艰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江苏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为党尽责、为国奉献、为民分忧的担当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勇挑重担,以“两个率先”的过硬成果谱写好中国梦江苏篇章。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



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

胡和平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需要深刻认识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实践意义和本质要求,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深刻理解群众路线理论内涵中增强自觉性坚定性

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首先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理论,深刻理解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

党的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区别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唯心史观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认为先知天命、英雄人物、帝王将相等决定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仅仅是“陪衬”、“工具”和“手段”。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从而第一次科学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群众观,规定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强调共产党人的根本使命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

主义群众观。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深刻理解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科学性,真正把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自己的思想中、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不断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

在深刻认识群众路线实践意义中增强自觉性坚定性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党9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具有巨大威力,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传家宝。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党创立和发展群众路线的过程,也是不断践行群众路线,实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在早期我们党还比较弱小的时候,正是依靠群众才生存下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积极发动和依靠群众,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就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主要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出台了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项规定,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我们党在群众路线上的最新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作风保障。

实践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90多年来,我们党的事业发展始终与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群众路线贯彻得好,党的事业就能顺利推向前进;什么时候违背了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遭受挫折。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深刻认识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才能真正把践行群众路线作为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法宝,不断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

在深刻把握群众路线本质要求中增强自觉性坚定性

不同历史时期,党面临的任务、环境、条件等都不尽相同,但践行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当前,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践行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不断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始终做到代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

代表群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代表群众是前提、是立场。代表群众,一是要自觉摆正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常用“血肉联系”来形容党群关系。血肉联系,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二是要真正对群众负责。必须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坚定站稳群众立场,始终代表群众利益,多用群众的眼光、多从群众的角度来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三是要改进作风。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着力解决好“四风”这一影响党群关系的大敌,真正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依靠群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是关键、是根本。我们党的全部权力来自人民,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最终依靠力量还是人民。依靠群众,一是要依靠群众的活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是发轫于基层实践、起始于群众创造。二是要依靠群众的智慧。推动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完善民主决策机制,从基层群众鲜活生动的实践中寻找智慧。三是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四是要依靠群众的监督。大力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让领导干部习惯在监督的环境下工作。

服务群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服务群众是目的、是宗旨。服务群众,一是要尽心竭力为群众圆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主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关切,帮助他们解决好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二是要健全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坚持蹲点调研、结对帮扶、下访接访等长效机制。三是要提高服务群众能力。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以过硬的工作能力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作者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强化民本理念 践行群众路线

陈震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从商周时代的盘庚“重民”、周公“保民”，到春秋时期的孔子“爱民”、孟子“贵民”、荀子“民水君舟”，再到汉唐以来各种内涵的民本论，传统民本思想不断发展、完善，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理念之一。

进入现当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吸收传统民本理念的合理因素，推动民本理念实现了新的发展和飞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就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作为省委主要领导教育实践活动的联系点，省发展改革委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各项决策部署，按照“走在前列、成为示范”的目标定位，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作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借助于活动提供的契机和载体，着力树创“四个一流”机关形象，推动全委全系统认真践行群众路线、着力强化民本观念，更好地发挥“两个参谋部”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健发展。

一、突出改革创新，进一步转职能改作

风，以抓改革促发展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改革创新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发展改革部门来看，必须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加快转变职能、持续改进作风，真正做到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推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作用的正向叠加。一是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活动过程中，我们一举取消和下放了70项部门层面行政审批权限和直接办理事项，实际运作及其效果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二是着力强化规划引领。要在科学编制规划的基础上，着力强化规划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在权限范围内积极探索只审批规划、不再审批或核准具体项目的办法。三是不断提高行政效能。真正做到对基层和服务对象申办的事项、提出的要求，该办能办的抓紧落实直接办；该办但确有实际困难和障碍的，共商可行办法，主动衔接争取办；有政策法规刚性约束或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及时说明原因，告知基层和服务对象为什么不能办。

二、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加大调整转型力度，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扩大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必须以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把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过程变成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推动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质量不

断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一方面,要全力稳定经济增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在努力稳定外贸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继续增加有效投入,特别是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力促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只有加快调整转型升级,才能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三、贯彻绿色增长方针,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满意度。生态环境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一是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抓紧出台并认真实施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配套形成规划联动体系、法规政策体系、推行执行体系和成效评价体系,力促各地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目标,合理构建建设开发、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三大空间。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在试点基础上研究提出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性意见,积极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二是更大力度推进绿色发展。认真落实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制度,优化能

源消费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严格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切实从源头控制高能耗项目建设。组织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工程,确保到2015年全省70%的国家级园区和50%以上的省级园区完成循环化改造。三是着力建设生态宜居环境。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全面实施“蓝天、清水、绿地”工程,落实水、大气、土壤等基本生态圈综合治理任务。积极支持、协同配合推进美好城乡建设,努力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路子。

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民众。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大力实施民生幸福工程,立足民需办实事、着眼长远建体系,协同有关方面,统筹做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工作。当前,要以牵头组织实施全省“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为抓手,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着力强化普惠性,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作者为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党组书记)

(下接第63页)秘密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了一下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

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叶剑英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叶剑英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为保护南昌起义将领,提供敌人高层决策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摘自2014年第3期《湘潮》)

新时期群众工作应突出四大要素

吴朝武

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正确把握时代精神,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紧紧围绕“人民”“法治”“民主”“创新”四大要素,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以崭新的面貌、务实的作风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

彰显“人民”分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民”是强调最多的一个词,而语意与“人民”关联的如群众、民心、民生等很多。十八大之后一年多来,习近平同志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讲得最多、讲得最深的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利益调整进入深水区,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会不断出现,而且情况更加复杂,表现更为多样,解决难度更大。人民群众对利益的诉求仍然是时代音符,维护群众利益仍然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点。我们对“人民”要有更新、更深刻的理解,要在工作理念、思想感情、服务态度、办事能力上有进一步提升,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透过信访工作的窗口看近年来社会矛盾运行情况,信访总量高位运行的态势还不会根本改变,新时期跨越发展伴生的阶段性矛盾日益突出,党群、干群关系面临更多的复杂情况和严峻挑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首先要教育帮助各级干部增强宗旨意识,端正“三观”、克服“四

风”,切实解决好对待群众的感情、立场、观点问题。

通过对多年来全国大量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剖析,可以深刻感受到:再好的政策也离不开群众工作的保障;千难万难,做好群众工作就不难;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实际上就是做群众工作,只有群众问题解决了,改革才有动力,发展才有环境,稳定才有保障。把干部作风制度化,强化干部同群众的直接联系,已成为党密切同社会关系的必然选择。

运用“法治”思维

十八大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些年,社会矛盾和信访问题较多,由于一部分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导致一些影响干群关系的问题由小变大、解决由易变难,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一些党员干部不依法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有着很大关系。

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和信访问题的发生,必须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一方面,要坚持依法行政。当前要尽快在省、市、县三级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最大限度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更加注重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建立完善和落实相关政策,妥善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社保以及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等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要运用好“两种手段”,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即宣传教育手段和依法维护公共秩序的手段,做到合理诉求依法解决、不合理诉求依法解释、违法行为依法处置。对群体性事件坚持“五个到位”,即调查研究深入到位、合理诉求解决到位、思想工作细致到位、法律手段跟进到位、后续工作完善到位,以此树立正确的导向。

体现“民主”方式

党的十八大把“协商民主”这个有效的模式和方法从基层经验上升到顶层设计,践行协商民主已经成为新时期减少政府决策失误、减少干部执政失误、缓和官民矛盾、促进干群有效沟通理解的重要方法。

针对人民群众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的现实,新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更应该体现一种“双向视角”: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视角,也就是带有单向性的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思路。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就是学会如何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反思我们的群众工作和有关思路。从第二种视角看,就要更加有意识地强化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尊重,多探索如何引导、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力,科学合理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

与此相关,在经济社会文化发达程度不高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是一个不断积累深化的过程,需要创造一系列的适宜条件。其中包括,需要不断培育和增强人民群众与其不断增强的主体意识相适应的主体能力,比如政策解读能力、参与能力、监督能力等等。我们要探索,如何把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拓展为人民群众参与制定政策、参与社会管理的锻炼过程。在这样的实践中,能进一步让干部、群

众学会并习惯于换位思考和良性互动,从现实问题入手,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打牢基础。

增强“创新”精神

近年来,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不断创新载体,把群众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谋划部署,真正做到了把解决认识问题、实践问题、现实问题和方法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尤其在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方面的巨大成效已初步显现。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创新还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性。

在群众工作机制、制度的创新和落实上,我认为各级党组织要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

一是要巩固落实好业已形成的务实管用的方法和制度。在深化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落实过程中,我们要突出制度的实践成效这一重点,用事实证明这些制度设计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要避免“花开满枝,结果不多”。

二是要完善群众工作的总体格局。建立由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协调、统战部门和群团组织具体负责、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做的党的群众工作总体格局。定期研究和部署群众工作,提出各个时期群众工作的目标、任务、要求,研究制订相应的群众工作措施,建立群众工作的规章和制度,强化督查落实。建立纪委、组织、宣传、统战、信访、民政部门以及群团组织、新闻单位等部门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分析情况,研究讨论问题。继续做好农村群众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城市中的“两新”人员、社会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进城农民工、闲散于城市的无业人员



红军长征与党的群众路线

大连海洋大学党建理论研究小组

80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在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这次征程是在强大敌军的重兵围堵、险恶自然环境的影响、党内严重分裂的干扰等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是对党和红军在勇气、意志和信念上的一次严峻考验,其行程之远、路途之险、困难之巨,举世罕见,旷古未闻。就是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党领导广大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突破重围、克服万难,取得了震惊中外、光耀千古的长征胜利。在长征途中,党带领广大工农红军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排除了各种艰难险阻。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的胜利,而且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胜利。回顾和总结长征时期党领导红军贯彻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宝贵经验和价值意义,对于当前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党员干部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践探索 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使党和

红军渡过难关

长征时期,党领导红军在国民党的包围下,始终处于不断转战、突围的过程中,途经15个省和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遇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差异很大。应当说党和红军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而且开展群众工作采用的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这一时期,党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

从党的内部来说,主要是党在红军内部开展的群众工作。一是严明红军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长征时期,红军将士从革命利益出发,严守军队纪律,所到之处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即使需要什么东西或吃老百姓的饭都要付钱,因而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二是官兵平等一致,无旧军队的军阀恶习。长征途中,红军部队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周恩来让受伤的机要参谋坐担架,彭德怀把自己身上的粮食倒出一半分给军团教导队长孙毅等事例,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

的群众工作,把各种新出现的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尽快纳入党的群众工作覆盖的范围。乡(镇)村、街(居)等基层党组织应整合用好群众工作站(室)等平台资源。

三是要完善工作机制。即进一步完善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活动机制、领导干部做群众工作的保障机制、群众工作的全党全社会参与机制、基层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

资源保障机制等。着力巩固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持“用脚步丈量民情”,着力解决抓好工作落实和密切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努力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细管理,每一户群众都有人贴心服务。

(摘自2014年5月19日《学习时报》)

“官兵一致同甘苦”的革命精神。

从党的外部来说,主要是指党领导红军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肉联系。一是积极宣传。红军在沿途都通过标语、歌谣、演讲、布告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性质、宗旨以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虚伪。二是真诚帮助群众。长征途中,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实际行动,真心诚意地帮助沿途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解决实际问题,增进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理解和支持。三是深入开展民族工作,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长征时期,党从实际出发,设置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制定针对性的民族政策,积极提倡民族宗教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并领导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和革命武装。1935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这是我党历史上设置的第一个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工作机构。长征中,我党颁布的《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等民族政策,明确要求红军部队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由于党和红军对各族群众真心实意地付出,因而也赢得了他们的回报。各族群众给予红军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甚至流血牺牲,党与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展现。

经验总结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长征时期,党领导红军在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历史经验。一是建立健全群众工作领导组织,保证群众工作具体落实。为了加强群众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长征中,各部队都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健全了群众工作的领导组织。中央红军从各军团到连队都设立了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二是创新形式,面向群众开展宣传。长征时期,党积极拓

展宣传渠道,创新多种宣传形式和方法。这一时期,党和红军主要以宣传标语、口号、指示、训令、通令、布告、歌曲、戏剧表演、群众大会等方式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对加强党群联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继续开展土地革命,解放群众。长征期间,党领导红军在经过的地区,继续开展土地革命,把土地革命和群众工作相结合,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解放贫苦群众,维护群众利益。1935年4月底,红九军团进占宣威。入城后,“首先打开敌人的监牢,释放了政治犯和无辜百姓,处决了一些酷吏,又没收了由官僚资本经营的‘宣合公司’等库存的火腿以及几家土豪劣绅的3000多担谷和许多财物,大部分分给了贫苦群众”。“在红军的影响下,甚至出现红军尚未到,名声早就到的现象,常有被压迫的农民派代表要求红军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四是重视民族工作,团结各族群众。党中央制定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建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为主要奋斗目标的民族政策。

这一时期,也留下了一些背离群众路线的沉痛历史教训。一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将红军的三大任务改变为单纯的打仗,取消了党的群众工作,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二是陕北肃反运动,使许多无辜领导干部、青年知识分子遭到逮捕杀害,破坏了党内团结,损害了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长征时期,我党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之时,战无不胜,军民团结,成功实现战略转移;背离群众路线之时,战事失败,民心涣散,革命有濒临绝境的危险。

价值追寻 群众路线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法宝

对理论发展的意义。一是提高了党对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水平。长征途中,党领导红军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在其所到之处,非常重视与当地群众的密切联系,根据每个地区特点制定具体的政策、法令、纪律,要求党和红军上下身体力行、模范地执行。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群众工作经验、方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实现形式和内容,从思想层面提升了党对群众观的认识水平。二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长征时期,党就很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党制定的民族政策就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三是奠定了党在今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群众路线的理论自觉。

对中国革命的意义。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打击了敌人,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革命基础;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长征战略转移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取得民族团结工作的进步,不仅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还

为今后制定和建立正确的民族统战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有益经验。

对时代进步的意义。一是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长征中,党领导红军宣传、组织和发动少数民族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推翻地主反动派的剥削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用制度、政权的形式确保革命的成果归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所有,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增强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意识。二是彰显了人民主体的价值观念。长征胜利,离不开党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认识,也离不开党发挥和实现人民群众主体的价值作用。为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党制定了尊重各族群众的民族政策,带领各族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给人民群众以实实在在的利益。长征时期,我们党坚持贯彻群众路线,赢得民心,实现了战略转移。同样,在随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也正是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把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和光辉成就。

(摘自2014年6月5日《光明日报》)



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

周银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道德素质要求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干部,他们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个性特征和思维特征。对他们道德上的要求,应循序渐进地进行道德提升,最后形成有益的个性与高尚的德行有机结合、相互助益的效果。为此,应避免领导干部道德素质要求绝对化的倾向,更多地向领导干部提一些既符合基本伦理规范,同时又不失人伦常理的道德要求,积极塑造领导干部的基本道德素质。

尊重。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尊重他人是我们的责任,这意味着把他人视为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一个尊重他人特别是尊重下属的领导人,就能承认他人存在的独立性,认可他人的创造性,珍惜他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成果,同时能够给他人的建议和意见以足够的重视。尊重表现了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情感和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各类困难群众,领导干部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只有尊重下属和群众的领导,才有得到下属和群众足够的尊重。

服务。邓小平同志说,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服务体现了领导活动的本质。领导活动本来就体现的是对公共权力的承担,对实现公共利益的追求,而领导干

部只不过是公共职位的短期占据者和实现公共利益的代表者。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时指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牢记宗旨、牢记责任,自觉把权力行使的过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过程,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做到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对于一个领导而言,其自身价值的最好体现,不在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展示,而在于其利用才能多大程度上唤起了下属的干事热情,实现了领导目标,服务了人民群众。

公正。公正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公共职位的占据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领导干部必须对公正有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任何不公正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在职位提拔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吏治败坏;在惩罚奖励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激励机制的扭曲。公平地对待人和事,实际上是要求别人公正地对待和评价自己的前提。领导干部讲公正,就是要让想干事者有机会,能干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合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任何领导者都不可能脱离合作而开展活动,从本质上说,离开他人的合作,离开下属的配合,领导活动根本就构不成领导活动。这是领导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根本所在。强调合作作为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就是说,领

领导人要以合作的态度开展领导。不是强调“你配合我做什么”，而是强调“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不是从形式上强调合作的必要性，而是从实质上认清合作之内在精神。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领导活动不过是整体工作的某一项工作，领导活动与执行活动，就价值层面而言，只是分工的不同，不是重要性的不同。合作就要团结，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就是最大的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诚信。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习近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一个不讲诚信的政府，在老百姓眼中就是一个不值得打交道的政府；一个不讲诚信的领导者，在下属眼中就是一个靠不住的领导者。而如果领导者失去了下属的信任，那么对领导的尊重也就随之消失，领导者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同时，一个不讲诚信的领导，很难与下属建立切实可靠的关系，从而就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也难免在决策中导致这样那样的失误，以

至于难以取得领导实效。诚信是一种力量，它使领导者坚定、自信、沉着，使一切虚伪者、谄媚者不自觉地产生畏惧，使敢于直言、敢于表达真实想法的下属脱颖而出。

自律。自律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道德准则，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达到自我约束、清正廉洁的目的。习近平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于律己，廉洁自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但这在我国当前执政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在党内尚未完全建立起自我警醒、自我调适、自我纠错、自我教育、自我免疫、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的现实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的施政行为更多依靠当事人的自律。“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这既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责任。严于律己的地方领导干部，能够在自己岗位上奉公守法，一心为民；而律己不严的地方领导干部，难免尸位素餐，贪婪腐败。习近平指出：“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是守住底线”。因此，能否做到严于律己就成为检验领导干部好与坏的重要标准。

（摘自2014年6月4日《光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的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做好干部工作指明了方向。去年以来,安徽省商务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厅上下深入开展以好干部20字标准和“四个不能唯”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三问”大讨论,全面加强“三严三实”集中学习教育,目的是让“干部三问”的冲击波深入下去,把“干部三问”的正能量转化出来。

怎样是好干部

应问自己。是不是好干部?是不是党章要求的好干部?是不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好干部20字标准是怎样理解的?理想信念是不是坚定,大是大非面前是不是立场坚定,有没有解决“信仰入党”的问题?为民服务是不是切实,宗旨意识有没有贯彻到实践中,将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勤政务实有没有落到实处,是不是都做到了深刻的“四风”体检?敢于担当做得如何,有没有为了群众的利益敢于冲破藩篱?清正廉洁是不是经得起考验?

应问组织。作为商务厅党组,要经得起来自方方面面的考问:有没有建立好干部的选用标准?有没有按照好干部的标准去选用?在选人用人的标准上,是不是突出了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在选人用人的导向上,有没有以“全国争先、中部领先”为要求,为谋事有想法、干事有章法、遇事有办法的干部提供舞台和平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勇

曹勇

做好干部工作 应从三个层面发问



于负责、真抓实干?在选人用人的实践中,有没有树立胸怀远大理想、政治立场坚定、始终与中央和省委保持一致的先进标杆?商务厅组织人事部门综合运用组织培养所具有的任务的强制性、目标的明确性、内容的针对性以及条件的优越性,促进自我培养向组织培养的方向发展,使组织培养成为好干部成长的孵化器。

应问社会。社会对好干部的评价是怎样的?好干部的公信力来自哪里?有没有自觉贴近群众,将群众对好干部的呼声和关注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和方向?有没有自觉深入群众,将群众对好干部的要求和期待量化为工作的指标和尺度?有没有自觉引导群众,将“服务在基层、满意在百姓”的好干部、好工作宣传推广,主动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工作主动?尽管不同时代的优秀干部、好干部各有特点,但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是始终不变的价值主线。一个地方政治生态怎么样,干部好与不好,群众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应坚持群众路线,改变以往检查考核“自说自话、自卖自夸”,考核结果“干与不干差别不大、干好干坏基本一样”的状况,形成群众评价新机制。

怎样成长为好干部

应问自己。有没有以好干部标准要求自己?有没有为成为好干部而付出努力?是不是主动学习提升自己,以“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打牢政治理论功底,提升经济综合素质,夯实履职尽责的知识

基础？是不是主动实践锤炼自己，到基层一线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需要的地方去，调研、挂职、蹲点，通过最前沿的实践和锤炼，坚定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的信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为一个群众离不开的好干部，面临诸多挑战。应克服干部成长道路上的不良心态，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以“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炫于五色之惑”。

应问组织。作为商务厅党组，对干部成长关心得够不够，有没有把干部培养工作抓到位？好干部要靠组织培养。作为干部成长的“娘家人”，商务厅组织人事部门要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以党性教育为核心，将为民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贯穿干部教育始终。搭建分类锻炼平台，强化监督管理，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话活动，将“手中权力”变为“百姓福利”，做到培养好、用起来、管得住。

应问社会。有没有给好干部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舆论氛围？是不是营造了干部成长的良好氛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干部选拔的理念有没有为群众所认可和接受？是不是获得了干部成长的群众基础，在干部学习、挂职、蹲点和调研等多形式培养上有没有受到企业、群众的欢迎和肯定？是不是取得了干部成长的舆论阵地，对干部的培养提拔有没有主动争取舆情主动，经不经得起舆情讨论？一名好干部的成长，离不开从身边人到全社会的帮助和鼓励。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好干部的养成也是一样。全社会对他们多一分理解，少一分猜忌，多一分关心，少一分责难，他们就会多一些干劲，多一点温暖，为群众多尽一份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多发一点光。

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

应问自己。自己是不是用好了干部？自己的潜能是不是发挥出来了？作为领导干部是不是调动了其他干部的积极性？自己心中要有一杆秤，时常拿“镜子”“三省吾身”，看看自己做得够不够，称不称得上是一个好干部，用了几个好干部。学会“放手”，学会“给权”，尊重他人意见，给予他人舞台，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

应问组织。作为商务厅党组，是不是全面了解了干部？是不是准确识别了干部？是不是科学评价了干部？把好干部用起来，近距离接触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不错”或是“不行”的模糊评价来决定干部是“上”还是“下”，需要健全考察的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来深入了解干部。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干部，不仅要看干多长，还要看干多少，更要看干多好，不能简单地“唯票数、唯分数、唯指数、唯岁数”选任干部。科学合理使用干部，就是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人尽其能。

应问社会。是不是存在“逢提必疑”的偏激情绪？当前在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给干部选任造成了不良的舆论环境。应该说，公众质疑干部升迁，既折射出现实中存在的“仇官”心态，又折射出深层次的问题是干部选拔任用不够公开透明。对选拔干部的相关情况要敢于公开，置于阳光下暴晒；对公众质疑要及时回应，一味地闪烁其词或保持沉默，只会激发一些人的“合理联想”；最主要的是要建立健全程序公开、操作透明、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拔制度，并严格执行，下决心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深入开展。开展“干部三问”活动,就是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中,更好地承担起和完成好肩负的各项任务。

问出党性。党性的灵魂是为民。党性的要义是务实。党性的本色是清廉。通过“干部三问”,切实增强为民这个党性之魂,信守政治忠诚;紧紧抓住务实这个党性要义,做到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清廉这个党性本色,严守道德底线,真正做到为民的可持续、务实的可持续、清廉的可持续。

问出形象。问出个人形象。打造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形象。问出整体形象。打造政治坚定、务实高效、团结和谐、充满活力的单位集体形象。问出组工形象。按照“建立健全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长期机制”要求,打造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组工形象。

问出新风。树立“五从”新风。一是“从严而治”之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三十条规定,坚持从严治厅、从严律己、从严带队伍。二是“从细而作”之风,保持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一心不二的职业操守、一着不让的创业追求。三是“从深而思”之风,具体到商务部门而

言,在对内承载与向外转移上有攻坚之举,在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上有创新之道,在主体培育和载体建设上有非常之功,在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上有破解之策,在促进市场建设和公平贸易上有守土之责。四是“从实而为”之风,坚持“走下去”“走出去”“走进来”,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察实情、重实践、求实效。五是“从快而行”之风,坚持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抓好第一时间贯彻、第一时间反应、第一时间部署,确保上级精神不落空、要求不打折、执行不走样。

问出责任。首先做到守土有责。党员领导干部要以主人翁的精神和对组织、对集体、对个人高度负责的态度,敞开心扉道真语,直抒己见献良策。其次做到守土负责。强化组织领导,搞好统筹协调,妥善安排和正确处理好业务工作和“干部三问”大讨论之间的关系,做到讨论、工作两不误,学习、教育双促进。最后做到守土尽责。通过大讨论,真正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得到大统一、认识得到大提升、工作得到大推进、活力得到大激发。将全体党员的智慧和力量集聚到共筑中国梦,践行“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的伟大实践中。

(作者系安徽省商务厅厅长)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李德顺



专家简介:李德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改革和发展、价值论、当代文化等为主要研究领域。著有《家园——文化建设论纲》《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实践价值丛书》等。

核心提示>>>

价值不是对象外部事物固有的,而是它和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生活发展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为尺度,来衡量任何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换言之,世界上一切好坏或价值,都不是对象和客体本身固定不变的属性,而是以人为尺度对对象所做的判断。

价值观念是每一个人的灵魂形式,是每一个人形成个人人品的根基。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政党来讲,它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决定了这个国家政党的性质以及社会信什么,因此也将决定它的历史命运,比如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有活力的还是僵化的。

价值,是以人为尺度对对象所做的判断

通俗地讲,价值指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口语当中经常用的好坏的概念。好是正价值,坏是负价值。好和坏是用一个正负的尺度来判断一切事物对于人的意义。跟好坏相关的同类性质的价值词,生活当中有很多,比方善恶、美丑、得失、利弊、祸福、荣辱、一件事重要不重要、值得不值得、应该不应该等。所有这类词,在生活当中、口语当中都可以用好和坏来表示,所以国内外对“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概括就是研究好坏的问题。这个好和坏的问题有什么特点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不是一个实体,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它固定就一定好或者一定是坏。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尺长的东西这个长度的概念,对谁来说都是一样的,一尺就是一尺。但我们在用一尺长的东西时,可能在一些地方不够长,在另一些地方又反而嫌长了,这种长短的概念就是价值的概念。再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小马过河。小马要过河,问老牛说河水深不深啊,老牛说很浅。小松鼠却说河水深的不得了,我们淹死几个了。那么河水到底深不深呢?小马的妈妈说你自己走走看看吧。小马自己过河时,发现河水既不深也不浅,很顺利地过去。河水到底深不深?我们就要明白深浅这个概念和深度这个概念是不同性质的。河水的深度是多少,比如水深一米或者一丈,这是描述河水本身

客观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因人而异的、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而深浅则是一个价值概念,就像我们饭煮硬了还是煮软了,对牙口不同的人来说,他的判断是不同的。

从理论上来概括,就是价值是主体性的、是因人而异的。要问什么东西有没有价值,有什么价值,它思考的方式和根据是对谁来说、用谁的尺度来衡量、以谁为准。价值不是对象外部事物固有的,而是它和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生活发展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为尺度,来衡量任何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换言之,世界上一切好坏或价值,都不是对象和客体本身固定不变的属性,而是以人为尺度对对象所做的判断。

所以,以哪个人、以谁为尺度来进行判断,就是各种不同价值体系的根本出发点、根本不同点。一个价值观念体系它是谁的,这个必须弄清楚,不可能所有的人价值观念体系都是一样的。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样的理论,是把价值和价值观念这两个词区别开来。价值是指客观的社会存在关系,社会生活实际的状态。价值观念则是对它的反映,受它决定,同时意识存在又有反作用,能引导它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探索、去创造、去追求。价值和价值观念,一个是客观的东西,一个是主观的东西。价值观念作为一种人主观的一种精神状态,实际上就是反映人的社会存在,表达人的价值追求。我们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条件出发,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在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观。

就像鲁迅说的,贾府上的焦大是不爱林妹妹的。因为焦大是贾府上的一个奴仆,他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等,决定了他的审美观、婚姻爱情观和贾宝

玉是不一样的。用贾宝玉的眼光来看怎么都是林妹妹最好,但是用焦大的眼光来看,林黛玉虽然长得漂亮,但是病恹恹的、小心眼、老耍脾气,伺候不起。焦大和贾宝玉对林妹妹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就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所以,世界上人的存在是多元的,我们不但有地区、民族、文化、历史的差别,还有性别、行业、个人经历、生活条件等许多方面的差别,那么社会上的价值观一定是多元的,而且即便价值观一样,也并不一定表示大家都会采取一样的行动。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思想观念的冲突,特别是利益冲突,这些都是价值冲突,不是事实存在知识和真理的冲突,而是价值观念的冲突,是基本利益、立场、导向、追求的冲突。

树立价值观念,是为了正确认识自己

强调一个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这不是向你灌输知识,也不是告诉你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要让你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是让你正确认识你自己,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生活在社会的什么境况下、有什么样真实的需要、有什么样的能力,在你的需要和能力当中,你现在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首先是什么……价值观是个人的,也可以是一个群体的,一个企业要有一个企业整体的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也会有它核心的、主体的或者叫主导的价值观。价值观建设的关键、根基在于主体的自觉性,就是正确认识自己、把握自己,从这一点出发去选择自己追求探索创造的目标。

价值观最忌讳“傻子过年看邻居”,比如现在社会流行什么,我就认为什么好。或者是我崇拜的名人他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从价值主体性我们可以联想到价值观念主体性,价值观念的主体性最重要

的就是解决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定位、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对同一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理想和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想把握好价值观的建设,重要的是自觉。就像贾府里的焦大和贾宝玉选择老婆的尺度标准应该怎么定,贾宝玉要知道贾宝玉自己的,焦大要知道焦大自己的,这样形成的价值观才是自己可靠的、对他自己有益的。价值观的特点是它虽然有主观性,在社会上也是多元的,但是社会上价值观的多元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每一个主体自己要把握好自己、理解好自己,我就是我,我只能要或者应该要的就是这个,别的诱惑动摇不了我、改变不了我。

价值论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价值多元论提出疑问——价值多元,那怎么统一?其实,在科学知识真理问题上,每一个题的正确答案是唯一的,比如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但价值问题的统一并不是单一的。国内外学者进行大量的研究和争论后,提出的结论性看法是价值和文化的统一,它不是把大家都修理成一样的思维方式、一样的观点、一样的结论、一样的话语,而是一种多元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在价值观的主体性和多元性面前,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叫做面对多元化、坚持主体性的态度。多元化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主体性是每一个主体自己要把握的原则。就好像在十字路口上,往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走的人都有。我们不能规定世界上只有一条路或只准朝一个方向走,但对个人来讲,你只能选准你自己要走的一条路,而不可能同时朝四面走。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样一种价值意识——面对多元化坚持主体性。

在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科学共产主

义价值观时,马克思首先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老去琢磨马克思说的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其实马克思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描述,很多是直接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描述,反正把未来想象成为一个美好社会,怎么美好就怎么想象。而马克思为无产阶级确立革命价值观时,他真正做的工作是让工人阶级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比如工人阶级是个什么阶级,它处在社会的哪一层,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应该和能够担当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为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建立价值观的起点。工人阶级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从自发到自觉,就对自己的地位和使命有了深入的、正确的、有效的认识和把握。

价值观念是每一个人的灵魂形式,是每一个人形成个人人品的根基。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政党来讲,它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决定了这个国家政党的性质以及社会信什么,因此也将决定它的历史命运,比如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有活力的还是僵化的,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等。世界上的争论分歧困惑往往不是知识的问题。知识问题有科学家有专家研究,闹明白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科学实践证明了它是真理,任何人都得接受。而跟我们每个人相关的、思想生活当中的纠纷和冲突,都是在价值判断或价值问题上。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来讲,价值观的形成是人格形成的内在标志。而对国家社会来讲,这个国家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的形成,是这个国家社会自我定型的标志。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大家越来越觉

得我们的国家社会、我们的政党价值观建设的问题,越来越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因为对中国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的崛起,全世界好像都没有争议了,但是西方一些思想家老认为,中国经济越发展,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不解决,将来越可怕或者越微不足道。撒切尔夫人当年就说,中国能输出电视机,这没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可输出,所以中国不值一提。因此,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时,就给有关部门下达了一个任务,就是研究提炼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个工作从2005年启动到现在快十年了,已经有了一个文件上正式的说法,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

我们讲价值观念是主体性的。谁讲价值观念就是要讲你自己心里真信什么,你要什么,你追求什么,你想达到什么。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这个真心话对别人讲,你是亮明自己的旗帜,展示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是一个承诺,是你团结合作做出的一个承诺。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主体性上来讲,究竟是说谁的价值观?它首先应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政府坚持的核心价值,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坚持的核心价值观。然后,我们党的宗旨叫为人民服务,那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为人民服务要落实到哪些目标和方向上?都需要通过价值观来凝聚和表述出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不是怎么教育别人,而是要说明自己。

这套价值体系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在文章中曾讲,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内在要求。他特别在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政法工作

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邓小平说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说法的本意也是实现一种社会公平。其实,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一诞生就做出的最大选择和承诺。社会主义如果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老祖宗那里,包括康帕内拉开始,一直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平。而他们在设计未来美好社会的时候,最终想象的就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公平的社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原则的社会,这也是一个公平正义型的社会。

所以,从思想理论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同的最大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它的最大成就或最大贡献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由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把自由这种追求基本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资产阶级大革命初期有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但在实践中,博爱首先被淘汰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政府会以博爱为旗帜,博爱现在只是慈善团体的旗帜。自由和平等从道理上讲都非常重要,但是在实践中,有的时候只能保一个,那保什么?资本主义的实践证明,它那个历史阶段所能做到的主要是自由,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市场经济等,按照这种逻辑,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语。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最先进的、最前沿的那些思想家们也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如果不解决公平问题,自由也不能再发展了,自由也不彻底了。所以像罗尔斯这样的当代最有思想的思想家,他们都以公平做旗帜。社会主义则从一开始许诺的就是公平。马克思

中国经济总量，年内世界第一？

朱剑红

一则消息引起外国媒体热议：根据世界银行4月30日发布的《购买力平价与实际经济规模—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结果摘要报告》，以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1年已经达到美国的86.9%，比2005年的43.1%提高一倍多。据此，该报告作出预测称，今年中国可能超越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规模怎么突然长得这么大？购买力平价又是做什么用的？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内统计专家。

什么是购买力平价法

世行报告的结论是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那么，什么是购买力平价法？

北京师范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邱东教授介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开展国家间的国际对比越来越有必要。长期以来，国际上主要使用“汇率法”，即将各国以不同货币单位计量的经济总量折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汇率法的好处在于，简单直观，折算方便，全球公认。例如，中国2012年的GDP最终核实数为519470亿元人民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汇率法计算为82270亿美元。两个数字，一目了然！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因为汇率只反映了国际贸易中的货物和服务的货币比例关系，而且未考虑各国价格水平差异，同时汇率还容易受到利率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当汇率短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动时，会导致国家间的比较不合逻辑。”

例如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时，亚洲许多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使得这些国家按美元计算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汇率法，日本的经济规模在1996年是美国的60%，但由于日元大幅贬值，到2002年，却仅为美国的38%。“这就形象地说明，采用汇率法进行国际比较有着较大的缺陷。因此，国际统计学界一直试图探索推出一种能反映货币相对购

的《资本论》写了那么多说什么？就是揭露剥削的秘密，它的必然性、生命力和结局。所以，社会主义从根子上、从理论上一开始就是公平正义。

正义这个词定义很多，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一种叫自由型的，即自由就正义，不自由就不正义；一种叫公平型的，即不公平就不正义。我们中国现在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社会公平问

题。现在全世界国际政治冲突的一个最大呼声是什么？公平。所以，公平正义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世界所应遵循的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根据李德顺在《江苏讲坛》的宣讲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买力的方法对汇率法计算结果来进行补充,购买力平价法就是其中之一。”邱东说。

购买力平价是不同国家大致相同的货物和服务的货币价格比率,是指在基准国的一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对比国的等量货物和服务所需要的本币数量。假如说,在美国买一个汉堡需用一美元,在中国买需用5元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就是5。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些经济统计学家开始进行探索。自1995年起,世界银行同时公布两套GDP数据。一套是按照汇率法计算,另一套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2年,按照汇率法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排名第六,但按照当时世行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中国已经排名第二。

“其实,购买力平价法就是把国与国之间原本不可比的经济数据,进行直接比较所借助的统一的转换因子。得到这个转换因子,是通过全球实施国际比较项目来实现的。”邱东介绍,国际比较项目一般是5年为一期,从1968年至今已经组织了八轮。随着参与国际比较项目的国家不断增多,影响不断扩大,2008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决定,启动第八轮全球国际比较。本轮国际比较是历次参与国最多的一次,全球有199个国家和经济体参加。项目实施实行三级管理:在全球一级,世界银行下设全球国际比较项目办公室,负责全球一级国际比较项目活动协调;在区域一级,由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局、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独联体统计局、拉美和加勒比海经社理事会、西亚经社理事会等6个区域性组织分别负责本地区国际比较项目活动协调、技术方法指导以及区域购买力平价结果测算和发布等工作;各国统计机构是参与方,只负责按照统一方案组织调查,收集并提交基础数据。

中国为何对本轮比较结果持保留态度

国际比较的初衷是为弥补汇率法的不足,那么,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结果又有什么不足?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的主要比较结果为:2011年购买力平价为3.506,也就是说1美元与3.506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6.46。据此计算,2011年我国GDP为13.5万亿美元,全球GDP总量为90.6万亿美元;我国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4.9%,相当于美国的87%,居世界第二位。而按汇率法计算的全球GDP为70.3万亿美元,我国为7.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10.4%。

对于上述通过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结果,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有关专家认为,尽管世行国际比较项目的专家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工作,但各个国家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是不尽相同的。若在全球选择统一固定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比较,则容易对具体的国家丧失了代表性;如不同国家都选取对自己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各国间又因代表品不同而丧失了代表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个结果低估了中国的物价水平。按照全球国际比较项目办公室发布的结果,中国的物价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0%,只是美国价格的54%,甚至还低于非洲的许多国家。而我国的粮食、牛羊肉、汽车、汽油等商品的价格是比较高的,通过购买力平价却反映不出来。由于购买力高估,也自然就高估了我国的GDP规模。

为何出现对物价水平的低估?邱东认为,主要原因是方法上的局限性。尽管本轮国际比较的主要方法有创新、有改进,但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有些比较方法还

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论证。例如建筑品比较,这一轮采用了新的方法,即“投入法”,用建筑投入品价格,推算建筑成品的价格,也就是说,用诸如钢筋、水泥等产品的价格,来推算房屋的价格。显然,这一方法无法反映建筑品的“市场供求”,没有将诸如房屋这样的商品的“溢价”因素考虑在内,所以会造成推算的我国建筑品价格严重偏离我国的实际。而由于我国固定资本形成占比较高,这种偏离对我国购买力平价结果影响较大。事实上,世行发布的报告中,对方法的局限性也有详细的介绍。

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专家说:“国际比较项目是一项技术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统计业务活动,这一轮的比较方法应该说有许多改进和创新。对于其中的某些方法,中国积极地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及时沟通,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正是由于方法论的局限和购买力平价法结果运用导致中国GDP总量和人均水平的明显高估,中国官方不认可这些数据,但同意世行项目办公室在表明中方态度前提下,推算和使用有关数据。中国的这一态度得到了国际比较项目最高决策机构—国际比较项目执委会的认可,全球办公室在发布报告中认真执行了全球执委会的决定,并在其发布报告中的正文表述和数据脚注中得到了体现。

如何使用全球比较的结果

尽管用购买力平价法已经进行了八轮全球国际比较,但统计专家们都认为,购买力平价法的比较方法还在不断的探讨、改进和完善过程中。

事实上,对于国际比较项目及其生产的有关数据的局限性,世行全球办公室在其报告中专门做了论述。

一是提请用户注意:购买力平价法更适用于相似经济体间的比较,不太适用于对差异较大的经济体间的比较;产品类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可靠性要好于服务类,如住房、医疗领域的购买力平价误差可能较大;购买力平价只反映各经济体的总体价格水平,而不反映经济体内部的价格水平差异。

二是购买力平价不能用作汇率决定水平。因为汇率充其量仅能反映国际贸易中的货物和服务,但是对于非贸易部分,比如建筑、政府服务等,并不在国际贸易中。

三是将居民消费购买力平价用于贫困分析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各国的消费结构不一致。

四是不能对两轮间比较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或者说不能把2011年全球国际比较结果与以2005年全球国际比较结果为基准的外推结果进行直接比较。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负责人提醒到,我们应该充分地注意国际比较项目有关数据产生的大背景和技术说明,不能过度引申其统计意义,对结果也不能拿来就用,更不能简单套用有关数据用于经济分析和政策解读。譬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我国经济总量要大于汇率法,所以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等等。无论用哪种方法计算GDP,我们都必须看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很低,在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方面与美国、日本、欧元区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发展的任务还很重,路还很长。不管国际上如何排名,都只是一个视角或参考。

(摘自2014年5月6日《人民日报》)

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赢得事业

慎海雄

践行群众路线、改进作风,都要以党员干部的德行为依托。加强道德修养,关键就在一个“修”字。面对今天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如何修德?习总书记已指明了“路线图”。只有将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无惧硬骨头和险滩,我们党也必定能形成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事靠人为,事在人为。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总书记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引导党员干部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重莫如国,栋莫如德”。践行群众路线、改进作风,都要以党员干部的德行为依托。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修”,党员干部如果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就不可能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就不可能做到风清气正。因此,习总书记历来强调党员干部要注重修身养德,自觉陶冶道德情操,把“做官”与做人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总书记提出的“三

严三实”,第一个严就是严以修身。“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带领人民群众干事业,不畏艰险不惧万难,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跟你走,人格魅力不可少。而人格魅力,说到底就是道德的感召力。党员干部只有将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无惧硬骨头和险滩,我们党也必定能形成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加强道德修养,关键就在一个“修”字。人非圣贤,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要靠不断地修身,才能不断地提高道德境界。古人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里的淡泊与宁静,就是一种道德境界,就是哪怕物欲横流也不乱方寸、哪怕世风浮躁也不改坚守的定力。“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砥砺志趣才能挡得住诱惑,能耐寂寞才能守得住心魂。淡泊与宁静,不是天生的,而是“修”来的。“吾日三省吾身”,勤修,才能修出健全的心智,修出高尚的情操。

修德,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党员干部如果小事不慎、小节不拘,久而久之,必然积“小亏”为“大患”,导致堤溃、气泄的恶果。一些腐败分子的蜕化变质,往往始于日常行为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人体对疾病的免疫力,需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获得,道德免疫力,同样要在防微杜渐中锤炼而成。

面对今天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

部如何修德?习总书记已指明了“路线图”:一是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二是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三是时时处处见贤思齐;四是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道德营养。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先哲们道德修养的重要思想已经深深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历经风雨而不屈的精神脊梁。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当自觉传承弘扬民族的优秀思想,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实践主体。习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拜人民为师、向群众请教,这中间也包含着从人民群众那里汲取道德的力量。大爱无疆、仁者爱人、舍己为人、乐善好施的高尚品质,广植于中华大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要立足于从普通百姓中挖掘道德资源。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看到,无数善良诚实、勤俭淳朴的普通百姓,支撑着我们国家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礼失求诸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最可宝贵的道德资源,党员干部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自觉崇德向善,成为高尚道德的践行者。

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习总书记号召党员、干部以焦裕禄精神为镜,深学、细照、笃行,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就是要求我们以榜样为标杆,堂堂正正、老老实实、清清白白。“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焦裕禄精神是可亲可敬可学的。对照焦裕禄精神,深入查摆自己

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就能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

思想道德建设虽然是“软约束”,但也要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将“软约束”化为“硬标准”。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就是党员干部的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做人准则。以“三严三实”衡量自己、对照检查,才能做到“返璞归真、固本培元”,使教育实践活动真正洗涤心灵。党员干部要始终严于律己,做到慎独、慎欲、慎微、慎交友,才能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清廉、清介、清明、清正,既是对领导干部自律的要求,也是他律的着力方向。当前,要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不断完善制度建设,让自觉实践“三严三实”的干部得到鼓励、受到器重;让违背“三严三实”,慕浮华、图虚名、兴伪事的干部失去市场。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越是会做事、能力强的干部,越是不可放松道德修养。近年来,一些所谓的“能吏”误入贪腐歧途,堕入犯罪深渊,令人感慨唏嘘。由于放弃道德自律,缺少有效的他律,干事“能力”成了道德堕落的“助推器”。于自身,是咎由自取,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则是严重危害。这就警示我们,牢记习总书记的指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才是对党员干部最好的爱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道德建设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德决定民德,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对整个民族的道德建设有着决定性的示范作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积善成德、明德惟馨,都需要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作出表率。“清其流者必洁其源,正其末者必端其

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

王东京

最近应邀参加一个学术会,研讨“改革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主题好,专家发言也有见地,只可惜听来听去却不见有人说清楚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究竟是何关系。而且对“顶层设计”的理解,大家也说法不一:有人认为顶层设计就是“最高层设计”;而有人则认为是泛指“上级设计”。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见仁见智,我这里也说说自己的看法吧。据我所知,学界对顶层设计的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不是说以往改革无顶层设计,举世公认,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早有顶层设计,不仅从前有,而且一直有。既如此,可为何今天要突出强调顶层设计呢?用不着去猜背后的原因,也不必相信道听途说,我的解释,是今天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像以往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也已无石可摸。风险在加大,若无顶层设计,零打碎敲,改革将难以向纵深展开。

我说中国改革有顶层设计,不过客观地看,过去的诸多改革主要还是靠“地方实验”。所谓“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是对已往30多年改革路径的基本总结。典型

的例子是农村改革,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可不是先由顶层设计,而是地道的农民创造。国企改革也如是,政府最初的思路是复制农村承包,以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可实际做起来却事与愿违,出现了普遍的短视行为。国企改革真正取得突破,是山东诸城的“股份合作制”实验。

是的,中国的改革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地方实验密不可分。换句话说,若没有这些年地方改革的各显神通,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于是人们要问:现在强调顶层设计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主要由地方实验”向“主要靠顶层设计”的转折点呢?如果是,那么这一转换的约束条件具体是什么?再有,如果说未来改革主要靠顶层设计,那么哪些方面的改革由顶层设计,而哪些方面的改革仍应鼓励地方实验?

这些是亟待回答的问题。我的看法:顶层设计与地方实验两者并无冲突,可以并行不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同时也需要地方实验。理由简单,顶层设计不是拍脑袋,要以地方实验作支撑,若无地方实验,顶层设计则无异于空中建塔,没有根基

本”。匡正道德风气,必须先修官德,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唯有激浊扬清,让越来越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涌现出来,才能发挥强大的引领作用,

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据新华网北京2014年5月23日新媒体专电)

设计就难以落地。同理,地方实验也不可包打天下,有些改革仅靠地方实验难以成事,如当初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要是没有中央的顶层设计,靠地方的局部实验怕是无能为力吧。

改革呼唤顶层设计,改革也离不开地方实验,可顶层设计与地方实验到底怎样分工?从理论上讲,其实就是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说,计划与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若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比市场配置低就用计划,否则就用市场。同理,改革选择顶层设计还是选择地方实验,归根到底也是要看交易费用。然而困难在于,交易费用难以计量,我们无法直接用交易费用作比对。

不能直接拿交易费用比较,那是否可用其他间接的办法?思来想去,我首先想到的是从改革的外部性角度去权衡。比如说,若某项改革不仅让内部人受益,而且也能让外部人受益,则此改革具有“正外部性”,这样内外受益,皆大欢喜,交易费用自然不会高,于是也就可放手让地方实验;若某项改革只是内部人受益而外部人受损,此改革则有“负外部性”,有“负外部性”的改革,就不宜由地方实验而要通过顶层设计,否则一旦出现利益冲突,交易费用会大增。

这是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即是从利益的分配状态看。改革本身就是利益的再调整,在经济学里,利益配置是否最优通常是以“帕累托最优状态”衡量。而所谓“帕累托最优”,是说利益分配达到这样一个状态,不减少一人的利益就无以增加另一人的利益。若非如此,不减少任何人的利益就能增加另一人的利益则属“帕累托改进”。由此,我的推论是:凡属“帕累托改进”的改革,可由地方实验;而要打破原有“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改革,则需顶层设计。

以上角度虽不同,但结论却一致。若说得再明确些,但凡让他人利益受损的改革,均得通过顶层设计,不然不协调好各方利益必产生摩擦,改革就会举步维艰。回首以往的改革,农村改革之所以在地方实验成功,重要的原因是联产承包让农民受益而未让城里人受损,没有负外部性,是“帕累托改进”。而这些年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是由于有人受益而同时有人(那些被精简的人员)受损。也正因如此,所以政府改革需顶层设计。

不必多举例,有了上面的原则,其他改革便可依此类推。跟下来的问题,是怎样理解顶层设计。我的看法,顶层设计是指“最高层设计”而非“上级设计”。相对乡党委(乡政府),县委(县政府)是上级;相对县委(县政府),市委(市政府)是上级。显然,一旦改革有负外部性,地方政府很难自己平衡好。想想碳排放吧,大家都赞成限排,可若无中央顶层设计,一个县、一个市怎会主动限排?万一你限排别人不限排怎么办?地方政府都想追求利税,请问限排的动力从哪里来?

(摘自2014年6月9日《学习时报》)



对“裸官”从严管理,800多名干部被调整,其中9名是厅级……广东省“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近日完成。

不仅限制提拔、堵住“裸官”升迁,还对在重要岗位的予以调整,伴随着中央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广东率先向千余“裸官”开刀。广东省委组织部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表示,限制提拔、调整岗位不是目的,最终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裸官”未必都贪,却是贪腐的“高危群体”。今年2月底以来,广东全省开展了一项旨在摸清“裸官”情况的全面调查。其中江门市对6000名科级以上干部进行了重点调查,东莞市则为全面摸底发放了3万多份调查表。

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对“裸官”情况全面摸底源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广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对巡视组反馈的意见,广东省委明确,迅速行动,全面核查处理好“裸官”问题。

根据工作方案,“裸官”要限时从重要岗位调整下来,其中省管干部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则在5月底前完成。

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对经过甄别、确认属于应当调整岗位的干部,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接受组织调整,两样必须选择一样。

根据摸查,此番广东共查出1000多名“裸官”,其中200多人选择迁回家人。6日发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显示,共对

广东重拳治理千余裸官

王华



866名干部作出了岗位调整处理。

毗邻港澳的东莞,被认为是“裸官”问题相对较突出的地方之一。据当地组织部门介绍,在这次专项治理中,东莞共对127名干部任职岗位进行了调整,其中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08人。

江门是典型的侨乡,家属移居国(境)外的干部也相对较多,在这次专项治理中,128人被调整岗位,其中处级干部13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集中治理中,9名厅级干部也被调整岗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广州市两名党政班子成员、广东省人大一名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都因“裸官”问题被调整,提前退出领导岗位。

反腐败研究专家认为,全省摸底、限时调整、集中治理表明,广东对“裸官”问题迈出了制度反腐的实质性一步。

近年,“裸官”外逃、落马的案件时有发生。从查办的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到,一些“裸官”有共同的“贪腐路线图”:腐败敛财—家属移居海外—转移财产—择机外逃。

在公众看来,之所以将“裸官”与贪腐摆在一起,在于一般公职人员的正常收入难以支撑配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费用,由此而怀疑“裸官”有较大贪腐嫌疑。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杨建伟在接受采访时说,“裸官”不一定是贪官或作风有问题,但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要求很高。既然你把家人移居到海外,那怎么相信你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摘自2014年6月7日《新华日报》)

从严治吏背景下的官员六种心态

袁 静

人民论坛杂志通过向东中西部10多个省市的党政干部随机发放书面问卷,有效调查了3450位党政干部,结果显示,压力大了、信心足了、牢骚多了、更纠结了等六大心态较为普遍,值得关注。

心态一:压力大了

“从严治官、高压反腐,给您带来的压力程度如何?”参与调查的党政干部中,51.35%的人认为与以前相比压力“大了很多,不敢去高档场所吃喝娱乐了”;38.77%的人认为压力“大了一些,各种应酬、灰色收入等更谨慎了”,两项相加共计达90.12%;另有3.25%的人选择了“压力相同,以前咋样现在还咋样”,2.98%的人认为“压力减轻,自身清正,作风建设越严越好”;选择“其他”的有3.65%。

党中央反对“四风”多管其下,深得民心,不少市民用论坛、微博等对政府机关不良行为予以“曝光”,让一些贪污腐败、公款吃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失去了市场,为今年的春节增添了清闲、清廉的新元素。湖南衡阳市委讲师团成新平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党政干部的压力确实大了,这种大“大得好”,官员压力大了,群众心就欢了。

心态二:信心足了

“对党的治理能力信心提高了多少?”选择“有所提升”的党政干部有45.33%,选择“较多”和“很多”的分别为27.15%和8.27%,另有19.22%的党政干部认为“没有提高”。

人民论坛记者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干部内心完全支持与认同这样的整治,“‘老虎’、‘苍蝇’一起打”、反四风,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年多来的举措持肯定态度。

从严治吏能否彻底扭转不良官风?受访官员持积极肯定态度的总计占比74.84%(51.25%的认为“可能性较大”,23.59%的认为“完全可能”);只有25.16%的受访官员认为“可能性较小”(占比20.08%)和“不可能”(占比5.08%),可见大多数干部对中央从严治官信心十足。

心态三:牢骚多了

参与调查的党政干部中,有11.21%认为“大部分”的官员会抱怨,47.45%的选择“半数左右”,两项相加比例达58.66%。可见,对从严治吏有抱怨、有牢骚成为不少干部的真实心态。该如何看待部分党政干部的这种“牢骚”?有专家一针见血指出:自古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部分官员过惯了“奢侈”日子,如今要求其过正常日子,自然会有抱怨,抱怨越大说明反对“四风”的成效越是显著,“官不聊生”才能民众幸福。

官员“叫苦”、抱怨最多的有哪些?“整风只是整了普通干部,领导该干嘛还是干嘛”列第一,占受访干部的35.66%;紧接着依次为“工资不高责任不小,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谁还愿做官”(占28.32%)、“官场潜规则如此,趁着还在位,谁不想捞点实际的”(18.93%);而“当官风险高,常常

一百个成绩抵不了一个错误,如此治吏不公平”、“要求脱离实际,官员也是人,不能苛求官员单方面遵守”两项分列其后,占比15.33%和13.22%;另有2.15%选择了“其他”。

不少受访干部表示,中央从严治吏我们完全赞成,但也要注意维护党政干部群体的正当权益,对一些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党纪党规也要进行修改完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指出,反腐也好、整治官风也好,“办法一定要细,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那么多反腐条规,如果随便哪一个都算,可能就没人给你干活了”。

心态四:更纠结了

受访过程中,不少基层干部表示,工资待遇原本就偏低,如果把各种补贴、福利都一刀切地取消,利益受损,干部晋升渠道又极为有限,去还是留让人纠结。在回答“会不会因此形成一轮官员下海潮”的提问中,认为“可能性较大”和“完全会”的干部有32.31%。这揭示了当前部分党政干部把公务员岗位当成“鸡肋”的心态,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去年5月份,人民论坛杂志所进行的“基层干部被误读状况调查”揭示了不少地区基层干部待遇差、空间窄、压力大,其生存状态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在从严治吏的背景下,少部分官员想离职下海实属正常。

另一种纠结心态表现在是不是还要尽力干活上,在回答“会不会减弱干部干事的动力”这一问题时,调查发现,认为“完全会”和“较大可能会”的干部有37.4%。“正常阳光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很有必要,有一个现象必须要警惕,即为‘既然捞不到好处,我也不干活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姜玮也认为。可见,在严厉整风的

同时,也需要有防止小部分官员工作懈怠的对策。

心态五:境界提升了

当被问及“是否赞同‘只要工作出色,适当腐败是可以接受的’”时,75.32%的受访干部认为“私拿一针一线都是腐败,决不容忍”,但也有17.45%的人选择了“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别占比10.12%和7.33%),另有7.23%的人选择了“说不清”。虽然与决不容忍腐败的人数相比,17.45%的比例只不过代表了少数干部的看法。但是,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一着不慎毁于一旦。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功罪不可相抵”。

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各级党政干部身系人民群众的福祉,身肩改革发展的重任,身负民族复兴的使命,必须处处作群众的表率、社会的楷模。榜样的力量始终为一个时代所需。官员道德失范、社会权威崩坏,诸如此类,正提醒我们那些为了政绩“可以容忍适当腐败”的“少数官员”正如何腐蚀着榜样的力量。就像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在研究腐败心理的基础上指出的,“潜在的腐败分子通常会在收益与风险间进行权衡,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揭露,严厉的处罚,从事腐败活动风险小获利大,就会铤而走险”。

高压反腐、从严治官,看似事无巨细,实则用功深远。“踏石有印,抓铁有痕”,每向不良作风触动一寸,都是累积通向新制度的更多一点基础;“面壁成佛”,官员自我境界的每一点提升,都是迈向清明政治的更近一步。

心态六:期待“刚性制度环境”

到底如何才能保持当前治理成果?在比较了“领导核心”、“制度环境”、“政治氛围”等几项因素后,70.16%的受访干部认为“刚性的制度环境”最为关键。经济学家林

毅夫认为,比起有形的公共品,政府应加大对诸如“规则、标准、政策”等无形的公共品的提供。因为“制度上的建设和改善能增进生产力、促进竞争,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减少社会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然而,“制度”在微观层面究竟如何作用?其解决问题、平息矛盾的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只有充分了解和掌握了这些,制度约束、制度反腐方才可能。而这些,又仰赖制度建设的外在环境。调查中,除了“刚

性的制度环境”外,也有超过半数的受访干部认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53.33%)和“赋予社会和人民群众必要的监督权”(52.12%)很重要。而“民主法治的政治氛围”(49.38%)、“官员主动报告相关情况,财产公示立即推进”(36.22%)位列其后(选择“其他”的3.15%)。在受访干部们看来,这些因素都虽不是最重要的,也是制度建设须臾不可缺的。

(摘自2014年5期下《领导文萃》)

南京手工真金云锦赏后感

圆 观

改朝换代了龙袍依然生辉,
帝王正寝时相伴的有云锦,
那天衣真是不朽而且无缝。

贡品的质地本已达到绝伦,
制作的技巧也是高出红尘,
让科学显得迷茫的是云锦。

图像都是真切地发自内心,
紫金山麓松鹤衔日海波平,
经百业纬文武事事为人人。

富豪们可以定制手工极品,
假冒的大师可以九五至尊,
惟有大众普遍敬仰者合身。

作于2014年6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一幅绚丽图画

——从青松合作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想到的

韩晓华 吴如彬 王 军

江苏固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作社是由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组织发起,以南京市高淳区青松水产专业合作社、南京青松固城湖螃蟹有限公司、南京德松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固城湖水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为骨干,有成员单位23个,社员3300多个,覆盖南京、常州、无锡、苏州、泰州等五市,涉及农户10万多户,是全省首个省级水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为入社的水产养殖户提供系统服务,以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在发挥水产品专业市场和水产品经营企业优势的同时,通过合作社之间的联合,开展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合作,形成规模优势,使全省从事水产养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利益共同体。为此,全作社利用这一优势,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机结合起来,描绘了另一幅绚丽的图画。

一、运用公司讲坛既讲科学技术又宣传马列主义

青松合作社本着“专业合作、规模增效、品牌共有、利益共享、服务社员、促进发展”的宗旨,通过科学有效的培训和管理经验、过硬的技术能力、同舟共济的态度和互利共赢服务社员的目的,将广大养殖户吸收到组织中来。

合作社的运作实行“六个统一”:统一品牌策划、统一苗种引进、统一技术培训、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产品收购、统一品牌销售。统一是标准化作业的代言词,有了统

一化的操作就能够减少独门独户、小打小闹的失误和弊端。青松合作社不断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三个优势”,分别是技术创新优势、规模品牌优势、文化理念创新优势。

为保护中国驰名商标“固城湖”螃蟹品牌,青松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合作社制定生态养殖模式,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塘口现场指导,提高社员养殖水平。用来自淳溪镇八字角村的合作社社员陈三宝的话说:“以前养螃蟹是看到别人放多少苗,自己放多少苗;别人喂什么料,自己喂什么料,心中没个底。加入了青松合作社,有了统一的生态养殖模式,只要按规程操作就行了。”

规模品牌优势明显。青松合作社不仅凭借养殖规模的扩大来减小个体养殖存在的风险,而且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近年来,各地螃蟹养殖面积不断扩张,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尤其是对公消费受限,集团消费下降,螃蟹收购价格下滑,社员面临增产难增收问题。合作社召开理事会,一方面积极外联,引进外地客商,推销社员螃蟹;另一方面,合作社以高于市场每斤20元左右的价格收购社员螃蟹。合作社抬价收购一开始,托起了高淳水产市场螃蟹收购价,带动全区蟹农增收。品牌意识的灌输,无形中也增强了养殖户的组织观念和自律意识,有利于改变小农习气、提高自身素质。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养殖好螃蟹只是第一步,通过蟹产业带动蟹文化,推动当地旅游发展才是更深层次的计划。因此,文化产业休闲、推广生态保护是修建“螃蟹博物馆”吸引游客的生态前提和基础。螃蟹养殖的尾水处理,成为环境保护的一大难题。为净化水质、保护生态,高淳区政府引进生物科技,生产微生物水质净化剂。尽管多方宣传推介,但养殖户将信将疑,政府给予农民一定资金补贴也难以推开。青松合作社理事长邢青松接受政府的任务后,及时召开合作社理事会,并利用讲坛宣传环保知识和大局意识,形成使用微生物制剂保护生态环境的共识,使微生物水质净化剂在合作社得到全面推广使用。与此同时,青松合作社还发动社员回收生产、生活垃圾,让高淳的水质更优,固城湖螃蟹品质更好。

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支撑,既培养了建设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力量,也符合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有与新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素质和道德风尚,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培养离不开基层组织的教育。合作社是农村中能让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的组织基础,有了这一依托,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讲座学习、电影欣赏、读书交流和政策指导等等。讲座的内容可以设计为群众感兴趣的,例如当前群众关心的二胎政策、城乡土地一体化以及拆迁问题、干部的廉洁、制度转型中的公平问题等政策问题,也可以是党的最新理论的宣讲和最新理论成果的解读;语言表达的形式可以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白话,也可以是经过自身消化理解的理论知识;讲座的嘉宾可以是乡村里的草根讲师,也可以是区里各个机关单位的负责人,这样既可以贴近群众又可以加强公信力。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新农村建设插上了理想的翅膀

1. “富脑袋”与“富口袋”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知识基础。经过几年的螃蟹养殖尝试,社员的口袋逐渐富了起来。邢青松意识到,只有让社员的脑袋富起来,螃蟹产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农民口袋才能长久致富。于是,合作社聘请省、市、区水产养殖专家、营销专家,还有区委宣传部党教理论专家,每月举办讲座、培训班,年培训社员2400多人次。邢青松还主编了《三蟹经》、《青松合作之路》专著,免费送给社员作为工具书;合作社出刊《青松传递》报纸,为社员传递行情、动态信息,不断丰富社员的精神食粮。来自砖墙镇张家村的合作社社员张训贵说:“我加入青松合作社后,学到不少新的知识,懂得更多新的道理。”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宣传不能一味的呆板和说教,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先进理论知识是必然之举。农民养殖螃蟹,改变了以往的谋生方式,养殖业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口袋的富裕必须与脑袋的富裕相匹配。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注意到,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必须选择合理的方式来让农民掌握知识。青松合作社的成立,有组织有纪律,有约束有引导,青松合作社经常邀请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做讲座,讲座内容包括道德、文化、经济、技术、法律等各个方面。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村干部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提升。

2. 基层农民学校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组织基础。青松合作社是依托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全国最大的螃蟹交易市场高淳水产批发市场(2013年市场交易额38亿元,水产品交易量2.85万吨)建立的,牵头的南京青松固城湖螃蟹有

限公司,是集生态养殖、自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型水产经营企业。合作社已形成“农户+基地+专业社+专卖店+市场”的有效模式,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企业发展积累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各水产专业合作社在组织农民进行水产养殖、合作营销等方面也具备了基本的条件。

高淳的螃蟹养殖户都以加入青松合作社为荣。今年3月28日,青松合作社召开2013年度社员分配大会,高淳区领导孔德华、王胜平、王国平、甘成功及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230多位社员冒雨参加会议,走廊上都站满了人。30多名申请加入青松合作社的螃蟹养殖户,经合作社理事会审议,现场加入合作社。还有30多位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承包合同、村委会证明的养殖户在会场外申请加入合作社,因入社要经理事会审议,当天未能入社。养殖户争着要入社,这种场面在农村是多年难得一见的。

农村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是教育农民、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新农村建设者的组织。不仅如此,合作社还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保持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核心地位。以“践行科学发展,永葆先进本色”为主题,青松合作社依托公司讲坛这一载体,有效建立了学习型组织,让农户接受党的教育,并建立了党总支工作制度、发展党员方针、“三会一课”等制度,为各种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基础。

合作社这种“基层学校”的建立,能够让农民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利益;而在学习中加入方方面面的内容,又有利于帮助农民提升综合素质。

3. 进行诚信教育和道德教育,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文化基础。青松合作社依托宣传载体和自身的品牌效应,不断培养诚信意识。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面对诚信意识与经济利益的时候,不少农户往

往被经济利益冲昏了头脑,容易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因此,培养农民诚实守信的品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不可少。

在螃蟹交易中,螃蟹大小相差一点可能价格就有较大变化。农民收购中,只重2.9两与3两,3.4两与3.5两,3.9两与4两的螃蟹,每斤收购价格往往相差10—20元。有的农民为了增加螃蟹重量,在市场交易前,将螃蟹沉入水中长时间浸泡。这样,经营户收购的螃蟹,一是只重不足,掉规格;二是螃蟹活力不足,伤亡多,影响固城湖螃蟹品牌声誉,造成螃蟹价格下跌的恶性循环。因此,每年螃蟹上市前,青松合作社通过召开会议、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号召广大社员自觉做到螃蟹不湿水交易,经营户做到不收购湿水螃蟹,不销售湿水螃蟹,维护固城湖品牌形象。

不仅如此,青松合作社的骨干成员还以身作则,诚信经营,将青松品牌做大做强。随着螃蟹产业的发展,青松水产专业合作社将固城湖螃蟹专卖店从南京开到了北京,并且开设网店,线下线上联动。

2012年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邢青松接到客户电话:“你们的螃蟹为何甲壳是软的?”邢青松说:“对不起,我半小时左右赶到。”邢青松重新带上螃蟹,并向客人道歉:“是我们没有告知厨房,螃蟹蒸煮过程,水烧开后以12—15分钟为宜,超过20分钟,甲壳会发软。”客人们品尝着邢青松现场指导蒸煮的螃蟹,个个赞口不绝。从此,六位客人成了青松合作社的义务宣传员。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青松合作社在组织人、教育人、提高人的过程中,无疑把自己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支秀笔,正在绘制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新农村图景。衷心祝福她们!

向新加坡借鉴什么

黄 靖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至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一个拥挤落后、遍地贫民窟的城市,建设成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国家。李光耀先生以强人政治方式创建的新加坡,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始终保持着其一党统治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建立了稳固有效的民主执政体制。在战略发展的大视角下,新加坡不乏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的经验。

经济发展面向世界。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唯一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是人力及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据此,新加坡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面向世界的发展战略,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第一,新加坡以世界发达经济为标准,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建立并严格实施各项经济法规和准则。第二,全力打造一流的基础设施,创造优质安全的生活、投资和工作环境,对人才管理、物流进出都制定严格的制度规范,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对外资和外企的吸引力。第三,根据新加坡具体条件,优先发展航运仓储、金融服务、石油炼化、生化制药、酒店客运等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耗能的产业。第四,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保持低价便捷的营运服务。这些举措使得新加坡在短期内迅速成为亚太地区贸易、航运、金融和交通的枢纽,同时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使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始终保持在世界前列。

政治发展注重制度化建设。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瞬息万变,

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新加坡,政治局面也不甚稳定。同时,新加坡在族群、文化、宗教、语言等各方面都高度多元化。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下,新加坡却能够始终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人民团结,关键在于其强力有效的政治体制。其一,权力的制度化。即最高公共权威的非人格化——宪法代表政治体制中的最高权威。在宪法的规范下,权力的设置、授予、更替、运作、分配,以及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等,都是由严格的制度来界定和规范的。其二,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的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随意更改的程序。其三,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各种政治参与形式——选举、集会、抗议、听证、游行、报告等涉及广泛民众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必须依法按照既定的制度进行。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始终不懈地抓紧以上三个“制度化”的建设。因此,尽管长期以来保持着一党执政的局面,但不论在人民的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范围、深度上,还是政策制定方面,新加坡的政治运行始终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在保持了政治长期稳定的同时,也保持了政府的高效、清廉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以“居者有其屋”为核心政策的社区建设。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没有广袤的农村,从建国伊始就确立了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建国路线。因此,新加坡始终将“居者有其屋”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从而

为长期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均表明,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旦出现大批居无定所、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必将发生动乱以至革命。在任何社会,发生大规模的革命需具备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大多数人贫穷到一无所有;第二,人民对今后的发展普遍绝望;第三,政府不作为,其治理的水平和效率都极其低下。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使得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居所,从一开始就培养了“有所失”的中产阶级,使其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维持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不仅仅从经济意义上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从决策到实施中的民主政治,调动了广大新加坡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引进和管理。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人才在政治、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整套人才的教育、选拔、管理和引进制度也因此形成。新加坡真正地做到了教育“从娃娃抓起”,由国家为具有各种特殊才能的青少年提供各类奖学金,通过最好的教育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发挥,并将教育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与人才的使用连在一起。人才选拔制度是新加坡一项十分独特的制度,使得新加坡在建国近50年来始终能够确保人尽其才,让优秀人才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各行各业充分发挥其才能和作用。在新加坡,无论是自己培养的人才,还是被引进的人才,都被置于一个公平的、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下。

对腐败的有效控制。新加坡最引人瞩目的文明发展成就之一,就是其对腐败的有效控制,在政府的廉洁有效方面,长期高居世界前列。新加坡在打击腐败上绝不手

软。首先,新加坡建立了三个十分值得借鉴的机制:一是政府设立了独立于各级主管的监督、考核官员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对各级官员进行制度化的监督;二是通过民众的积极参与来进行监督;三是通过媒体及时的跟踪报道来进行监督。这三个机制确保了整个监督系统的制度化、常规化、透明化。其次,成立了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腐败调查机构——反贪局。一旦在反贪局立案并进入调查程序,在得出最终调查结果之前,包括总统、总理在内的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必须回避,不得以任何形式过问和干预调查。其关键的一点,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保对腐败调查和处理的独立性。

通过“接地气”的政府运作扩大政治参与。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度建设,保证执政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其中,选举和议会的作用最为关键。一方面,议员的选举在各个选区中定期、公开进行;另一方面,议员在选区中设置办公室,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选民的访问,并通过议会代表将选民意见及时地转达给各级政府,以定期“问责”包括总理在内的各级政府官员的方式,敦促政府拿出解决办法。这样,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始终与社会紧密联系,保持高度的“接地气”。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人民行动党的党员身份上自总理,下自基层干部,党员身份从不对外公布,党的各项活动也以秘密形式进行。其根本目的,是将执政党变成执政过程中的隐身人,从而凸显法律和政府施政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执政党的主张和作用则“隐性”地贯彻于政府的各项功能和法律的实施当中,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执政党用生硬的政治手段获取自己的利益。

凡此种种,都十分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摘自2014年4月下《学术前沿》)



贪欲和傲慢催生腐败

廖政军

位于美国中北部的伊利诺伊州不仅“盛产”总统，更因“盛产”腐败州长而著称。据统计，过去40多年来，该州9任州长中有5人曾因涉嫌腐败案件被起诉，其中4位州长最终锒铛入狱。现任州长帕特里克·奎恩又在接受联邦司法调查，该州再度陷入严重的诚信危机。

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针对伊利诺伊州政府一项打击城市暴力工程的腐败案对奎恩发起调查，指控他涉嫌滥用职权及公共经费。此前，该州审计署已对奎恩进行审计调查，目标对准2010年奎恩为赢得竞选而推出的“社区重振工程”。该工程总预算5500万美元，被怀疑存在不少管理和经费使用上的漏洞。奎恩涉嫌通过设置多个预算账户绕开议会监管，并筹措行贿基金，违反了联邦反腐败法律。

截至5月17日，奎恩已根据要求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上千页的法律文件，极力为自己洗脱罪名。但除了挪用经费和行贿问题外，司法部门还认为奎恩涉嫌安排下属将上述工程中近15万美元的项目资金“中饱私囊”。尽管奎恩多次出面澄清与此事无关，但调查中的一些蛛丝马迹仍令此案扑朔迷离。28日，一个由12名司法人士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将就调查结果进行审议。无论结果如何，奎恩连任州长一事已生变数。

现年65岁的奎恩素有“政坛牛虻”之称，其政治生涯始于民间草根组织，被视为“草根改革者”。2009年，时任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卖官案”东窗事

发，副州长奎恩被“扶正”，此后成功连任。奎恩上台后曾誓言反腐，签署的第一项行政命令就是“给州政府消消毒”，发誓决不重蹈前两任“腐败州长”覆辙。

然而，“反腐州长”却也难逃遭受司法调查的命运。关于奎恩的腐败丑闻一经披露，不少当地媒体纷纷感叹，“腐败仍似病毒一样无孔不入，侵蚀着美国政府的肌体”。在美国，从联邦、州到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都存在腐败现象。上至国会议员、下至普通公职人员，都可能与腐败扯上关系。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内，共有两万多人因腐败被判有罪，其中后10年比前10年案件增加了3.2%。另据盖洛普公司最新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美国受访者认为，腐败是联邦政府首要应该解决的问题，降低联邦赤字、就业、医保等热门议题则位列其后。

近年来，美国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案件频发。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客观上为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其次，法律惩治力度不够。许多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帮助他们出谋划策，将惩罚降至最低，同时受指控的官员多以辞职了事，以逃避进一步的调查。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学副教授布朗对本报记者表示，从政治贿选到教育领域的贪污，从立法腐败到医疗卫生领域黑幕，腐败已蔓延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行业，“美国最大的腐败就是将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摘自2014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思辨之宗 大道之源

——《易经》的思维智慧

冯立鳌

编者按：中华文化有着多重内涵，对待中华文化，实有汲取精华、革除糟粕的必要。在丰厚广博的传统文化资源中，最具活性、最富启示意义的，当属古人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对待事物的行事方法。这是蕴含于文化深层的精妙所在，跨领域、无国界、贯古今。鉴赏这些传统智慧，识辨其中的优长和缺失，对于今人当有所裨益。

产生于殷末周初的《易经》，形成于民族心智开始定型的时代，它以特定方式凝结起华夏民族成长阶段的时代精神，构建了自己风格鲜明的思想体系，其深层理念对后来诸子百家认识世界带来了视角和方法上的引导，因而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即使在数千年后的今日，中华民族的群体思维方式、思维特征，依然闪烁着《易经》智慧的光辉。

系统思维

在对世界万物的归纳和反映上，《易经》采用了系统的思维方式。系统是由若干不同要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的思维方式即是将纷繁事物从结构和功能上归为统一整体看待的方法。

《易经》首先选用八卦作为系统化工具。代表相反属性的两种符号——“—”“--”三个一组为一卦，组合而成的八个基本图形合称为八卦。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是一个独立系统。借助八卦认知万物，为系统思维的运用创设了前提。其次，《易经》

的作者把八卦按上下方位相互叠加，得到六十四卦，并用这一卦画系统来比附说明万事万物的复杂变化，这一认知体系的建构表现出了更为鲜明的系统化思维模式。另外，《易经》在推演解说中将人、家庭、家族、国家、天下乃至天地宇宙等作为具有所属关系的系统进行认知，这一纵向互含的系统链进一步展现了系统的普遍性，强化了人们的系统思维。

《易经》的系统思维对中华民族后来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殷末的五行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得到了系统性的整理，由散状形态演化成了具备相互制衡关系的严密系统。兵家将战争的组织策划看作一个动态系统，医学将人及人的内脏器官视作具有各自运行规律的系统，人们也认可了由天地人组成的宏观大系统，“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受到广泛认可。

这种系统思维要求把组成系统的多项要素作为整体来看待，因而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看重整体的思想原则。《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儒家认为《春秋》“大一统”，法家主张“尊于一”，宋明时强调理、气一元论。虽然各派理论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对整体观的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的是整体高于个体的价值观；中国人在生活细节上常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顾忌，有“舍车保帅”的“一盘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大受弘扬，这都源于系统观、整体观对民族思维的影

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民族文化中的系统思维也为我们当今深化改革提供了理性支持。

和合思维

在看待事物的关系上,《易经》采用了和合的思维方式。不同要素间复杂的依存、交感和转化关系即是和合,和合思维方式即是看到相关联的事物在相互对立中相互交感、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一种思维方法。

《易经》中的“爻”有交错、联系之意,《说文》中直接把“爻”解释为“交”。八卦是由代表相反内涵的两种符号交杂而成,其中蕴含着的两端思维是和合思维的典型形式;《易经》每一卦都是按六爻构成的不同要素的交合,六十四卦代表着《易经》体系内互不重复、穷尽无遗的交合形式,足见和合思维是《易经》推衍的前提和根本。另外,在《易经》的卦象系统中,那些上下之间可发生交感的卦象则吉,如泰卦;相反,否卦因乾上坤下,天地不交感而不吉,否极泰来的吉庆态度就表达着对和合思维的肯定。

《易经》的和合思维与西方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略有不同,它关照的对象不限于两个,可以是一组要素群;并且它更看重不同要素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依存。和合思维对后来各家学派的理论建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儒家明确提出“和为贵”,主张在社会生活中用支持合作者的和合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功名与品格。老子认为“知和曰常”,主张通过不争、守弱的途径实现与对立方的和乐相处。法家韩非也主张通过君主的权力运作实现“上下和调”的政治目标。中国人历来认为“水至清则无鱼”,

认为“兼听则明”,肯定异质要素与不同意见的积极作用。思想家和民众的理念各不相同,但“贵和”却是共同的思维原则。本世纪,我们倡导“和谐社会”,和合思维在当代治国实践中仍然大放异彩。

变易思维

《易经》以变动不居的思维看待世界,认为万物的变易会体现在自身各卦象的推演过渡中,进而把认识和探求万物的变易视为自己的基本旨归。

通过卦象的推演和体系的展开,《易经》表达了关于事物变易的基本思想:事物的变易源于内部要素的不同交合;变易要经历一个渐渐积累的过程;变易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走向反面,等等。

《易经》的变易思维对后人有不少的启发和教益:正是感到了“亢龙有悔”“物极必反”的法则,孔子提出了中庸的处事方法,以防止“过犹不及”;老子主张以“知雄守雌”、坚守柔弱的方法,避免自身由强大走向毁灭;法家则用制度变革来应对社会生活的变易。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主张学识的“跬步之积”,认定保持德性之纯要“防微杜渐”等,古老的变易思维在此得到了新的展现。

人本思维

在观察世界万物及其关系时,始终以人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即是初级的人本思维。

《易经》卦画系统的创立及其推演始终体现着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六十四卦的绝大多数卦辞直接说明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政治活动,都体现着人本的立场,表现着对人事凶吉的看重。《易经》作者的着眼点和思考重心显然是社会人生,其理论

弘扬“义以为上”的传统美德

李翔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传统美德蕴含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仅在历史上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影响中华先民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借鉴意义。“义以为上”的精神,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旨趣,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明确反对见利忘义。儒家有所谓“君

子”与“小人”之别,两者的分界线在于是按照仁道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还是只顾谋取一己之私利。做有德君子,是儒家对人的基本要求。为此,儒家明确提倡“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放于利而行”,即提倡面对利益时首先要想到道德的要求,想到利益是否属于自己“应当”得到的;反对见到利益就把道德置诸脑后,甚至把追求个人利益当作行事的基本准则。

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在提倡“见

的致思过程在于:以人类关系来理解和思索天地关系,又从天地法则的高度来领悟和说明人类社会。虽然论及天地自然等复杂的现象,但其体系建构的本位始终是人本身。

有《易经》人本思维的导引,百家争鸣的焦点总是在社会人生方面;在科技领域,与人的生命生存直接相关的农学、医药学等得到了长足发展;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得到历代学者的认可,这一价值立论使社会观、伦理观在中华文化中形成丰厚积累。此外,人本思维使中华主流文化一直关注着人类社会“此岸”的存在状态,宗教神学始终未能取得主导地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确认并支持了中国传统的人本思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以人

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传统人本思维在被扬弃中得到发挥运用。

黑格尔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在万木争荣的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一株久历寒暑、年轮密集的劲松,其千难不衰的经历、抗风耐霜的生机和复兴在望的前景都是民族的外在表征,而藉由思维方式、思维特征表现出来的思维智慧,则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内在蕴涵。无论世间风云如何变幻,未来的兴盛终归会属于不弃智慧的民族。

(摘自2014年5月24日《光明日报》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得思义”而反对“放于利而行”的基础上,儒家也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强调“义然后取”,即只要是合乎道德要求的、理当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也就是说,反对在主观动机方面假仁义之名而行谋利之实,但并不反对在客观效果上因为行义而得到正当的利益特别是公共的大利。这一点体现得最典型的的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面对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提问,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表面看来,孟子似乎是将道德与利益对立了起来,只讲义不讲利。实际上孟子认为,行仁义的结果是“王天下”即结束战乱、走向统一。这不仅是黎民百姓最大的利益,而且是在行义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在客观效果上可以说是“义利双成”。

在特殊情况下应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说,当遇到义与利发生尖锐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特殊情况时,志士仁人决不为了苟活而做出损害仁义的事情,而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仁践义。

“义以为上”体现了以德性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追求。儒家认为,当道义与利益、德性与欲求发生冲突时,志士仁人理当超越利益的纠结与感性的欲求而致力于对道义与德性的追求,并在其中得到精神的满足与心灵的自由。由此,超越物欲与私利的诱惑,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

境界,成就以德性精神为依归的理想人格,就成为中华先民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特色。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安贫乐道”“淡泊明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都是这种精神境界的不同表述方式。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是做一个孜孜以求利、“放于利而行”、无德性、无操守的小人,还是做一个“义以为上”、行仁践义、行己有耻的君子,是关系人能否异于禽兽的大问题。这无疑对现代人能起到相当程度的警醒作用。如果说儒家的义利观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对“利”注重不够的偏颇,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求利甚至完全不顾“义”。在这方面,中华传统美德中“义以为上”的精神无疑有着纠偏作用。同时,如何在“义以为上”的精神主导下寻求“义利双成”,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化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人类需要阅读。人类几千年的创作和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跟饮食同等重要的精神营养补充。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地步,生活多么富足,我们依然离不开阅读。

然而,不容忽视的现实是,阅读正在遭遇危机。面对当下浮躁的社会心态,我们不能不反思,今天的阅读,到底丢失了什么?

我们丢失了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虚荣心”。读书人在过去人们的印象中是羡慕和尊重的对象。人们渴望读书,热爱读书,以读的书多为荣。一个孩子如果手上经常拿一本书更会被长辈们称赞,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去年湖北高考文科状元就曾经把《红楼梦》读了不下十遍;一些高考作文满分的学生,一般都是有超强阅读欲望的孩子;古往今来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哪一个不是喜爱读书的人?而且,那些学有所成者,往往都很注重阅读经典。可是现在,你手上有没有书、你读不读书,并不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我们丢失了对内容的鉴赏能力。读书并不应该停留在读故事,读故事只是消遣,真正的读书是增加人生的分量。

以文学作品为例。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写的是一个叫桑提亚哥的老渔夫,在大海里驾着一条小船打鱼,八十四天没打着鱼,生活没有着落,靠一个小孩给他四处讨吃的,到了第八十五天,他一个人下海,打到了一条大鱼,跟这条鱼较量了几天,把鱼杀死拖回港口,但一路上鱼被各种鲨鱼吃掉,等他回来时,鱼只剩下了一副骨架子。这是一部好作品。你可以把它当励志小说读,因为有大家都知道的警句:“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但往深处看,是一个老人的孤独,一个失败英雄的悲

歌,那种深深的孤独感才是作家想表达的。再看下去,你可以发现小说的语言奇妙、温暖,还发现它有许多象征的隐喻,更发现许多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比如,作家常写老渔夫梦见狮子,狮子也是沙漠和草原上孤独的英雄,这是老人对海的恐惧吗?等等。在这些之外,你还可以读出一个作家伟大的人道

主义情怀。老渔夫的那些可怜又可敬的大量内心独白,等于在和大海不停地说话,和命运不停地说话,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抱怨,没有诅咒,只有卑微的乞求和敬畏,宽容和理解。当你读完全篇,读到最后一句“老头儿正在梦见狮子”时,你感到对命运的隐忍也许是最伟大的。所以,真正的阅读会读出更多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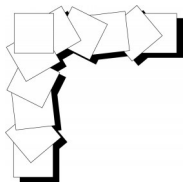
我们丢失了阅读耐心。在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手机阅读的“刷屏”让阅读速度加快,不想读的可以“刷刷”地跳过去。譬如微博,是典型的快餐式阅读。微博上是喧嚣的资讯的汪洋大海。那里有社会热点,人们可以天天做读者,还可以发帖做评论员,但长期下去,丧失的是冷静的思考和沉醉的阅读体验,丧失的是做一个有思想分量和生活质量的人。

传统的纸质书籍阅读,如果是自己的书,会在书上做许多记号,写下许多阅读笔

阅读丢失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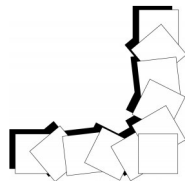
陈应松





“官不聊生”错在哪

润 苹



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

没了公款吃请,没了储值卡消费,吃粽子得自己买——对置身“体制内”的一些干部而言,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意味着又一次在“寡淡”中体会“清新”。

自八项规定以来,这种转变日渐成为“新常态”。广大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许多干部也由此卸下了包袱,不用再因送往迎来疲惫,不用再天天被酒精考验,不用再为坚持原则苦恼,关系简单了、环境单纯了、心态轻松了。

但也有一种不同声音,认为福利减少了、行动不自由了,当公务员“越来越没意思了”,甚至产生“官不聊生”的牢骚,以至于有媒体预测,新一轮“官员下海潮”或将到来。

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坐好车了,不敢上酒店了,连办公室也要

挤一挤了,这确实让一些干部不那么适应。用权的紧箍咒多了,违规的成本变高了,“摊上事儿”的风险加大了,也确实让一些人觉得“为官不易”。

然而,规范干部“吃、住、行、游”的桩桩件件,哪一项管得过分、管得过度了?用公款送年货节礼,应该吗?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不该管吗?铺张挥霍、劳民伤财,能行吗?转作风的各种要求,不过是让领导干部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要违法乱纪而已,还不到“为官不易”的程度,更没到“官不聊生”的地步。

有干部“吐槽”:干得挺多、挣得太少,没有点额外收入,不来点体外循环,拉不开栓。平心而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工资也应该水涨船高。然而,“工资低”的抱怨,并不能成为灰色收入、隐性福利的借口。还要看到,取缔不合理收入,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第一步。只有工资和收入统一了、规范了、透明了,公务员的真

记,还会回头去阅读已经读过的章节来体会前后的意思。会把好的地方折上,以后翻开永远记得最好的段落与句子,那些发黄的纸张则记下你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和成长。但是刷屏时代的阅读,在阅读之后的这些遗存全然不见,阅读没有了记忆。

我们不应该放弃一种伟大而充满尊严的阅读的传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与

其说在做梦中等待,在网络的迷惘中精神缺氧,在寻找灵魂的荒原中徘徊,不如马上拿起那些已经被时间证明了的作品来,开始安静的阅读。记得,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品格不会坏到哪去;一个品格好的人,一生的运气不会差到哪去。”

(摘自2014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实收入才不至于雾里看花,给公务员涨工资才会得到社会的理解。

相比于“低收入”焦虑,一些人“官不聊生”的慨叹,还在于“高风险”用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在任何时候,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用之何处,最能体现执政者的追求。如果把本不该有的特权剔除就感叹“为官不易”,把超标滥配的待遇归零就抱怨“官不聊生”,我们的觉悟和境界体现在哪里?我们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彰显在何处?

从这个角度,“为官不易”的形成,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为官不易”的感叹,则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说白了,正是因为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让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误以为这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如果还想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随着转作风深入持续推进,失落实属必然;如果只信奉“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风险不可避免;如果不懂得“畏法度者最快

乐”的道理,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痛苦还会加大。

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领导干部:“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心正心灵,则业勤业精”。公职人员之所以是特殊群体,就在于其是“公共人”,而不是“经济人”。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苦心孤诣于一己之私,根本不适合进入公职人员队伍。不从思想上解决好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不具有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从古到今,为官者的价值都承载于奉公为民上,体现在民意口碑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郑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追求,焦裕禄“我们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究吃穿,应该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情怀,至今令人感佩、给人启迪。找准了自身定位,明确了价值所在,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

(摘自2014年6月4日《人民日报》)





4G 时代能否少些宽带式忽悠

汤嘉琛

研发更稳定、高速的通信网络,公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在几大运营商跑步奔向4G时代的时候,或许他们应多掂量掂量,自己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市场是否真的打好了基础?

尽管很多人尚未弄懂2G与3G的区别,几大运营商已然将“战火”烧到了方兴未艾的4G战场。中国移动日前透露,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6个城市已完成4G试点,今年将建成连续覆盖主要城市的全球最大4G网络;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日前表示,已向工信部递交4G牌照申请;坐等牌照的中国联通,则近期启动了沃门户新官网域名,以此应对已到来的4G大战。

从2G、3G到如今的4G,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更迭让人有些目不暇接。在几大运营商描绘的蓝图中,人们在4G时代将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移动互联网体验,其下载速度“与3G相比快20~30倍”。只可惜,4G时代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骨感——至少从目前的用户反馈来看,4G网络获得的“差评”并不少。

运营商惯于将“极速体验”当作宣传噱头,但其中水分很多。不久前,央视联合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互联网监测分析中心,在全国多个城市对中国移动的4G开展网速测试发现,中国移动所宣称的4G“网速可达每秒百兆”,仅为实验室理论峰值数据,4G网络的实测平均网速仅为广告宣称的1/50。

广告中的“极速体验”涉嫌虚假宣传,但4G网络的资费却是实打实地高。当4G网络刚进入公众视野时,一个广为流传的

段子是,“如果谁开着4G流量不关,睡一觉醒来,你的房子就不属于自己了”。尽管这一说法被运营商辟谣,但从已经公布的资费标准来看,4G网络的费率确实要比2G/3G网络高出一大截。

在前期的试点中,4G网络的信号覆盖情况也饱受诟病。即使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许多4G用户都抱怨4G网络覆盖不足,有些地方信号时有时无,有些地方完全就是信号盲区。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4G网络技术刚起步不久、基站建设滞后有关,但单就用户体验来讲,现实确实与公众的期待有很大差距。

从世界范围来看,加速研发更先进的通信技术是大势所趋,拥有12多亿手机用户的中国,确实应积极参与到4G时代的“大合唱”中去。但是,如果为了在争夺用户时抢占先机,在技术尚不成熟时“打肿脸充胖子”,哪怕刚开始取得了看上去不错的成绩,也终将因用户口碑太差而落败,整个4G技术也将受牵累。

研发更稳定、更高速的通信网络,公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在几大运营商跑步奔向4G时代的时候,或许它们应多掂量掂量,自己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市场是否真的打好了基础?在过去几年中,消费者已经对“假宽带”等行业黑幕深恶痛绝,相关企业的商业信誉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当运营商们在4G战场攻城略地之时,还望它们脚踏实地研发新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少一些“宽带式忽悠”。

(摘自2014年6月5日《光明日报》)

十大元帅传奇入党历程

尹家民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十大元帅人人都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入党经历也充满着传奇。

朱德:由周恩来介绍入党

共和国元帅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员的是朱德。说起朱德的入党,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1922年初夏,朱德经朋友介绍,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初级读物,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而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家乡、亲人和朋友,登上一叶扁舟,顺长江东下,找共产党去了。

他到了上海,踏遍了整个市区,没有找到共产党的踪迹。他只好到北京去继续寻找。

在北京,朱德仍然找不到共产党的身影。他只好又回到上海,在这里见到了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可陈独秀对他并不热情。陈独秀冷冰冰地看着朱德,不客气地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此献出生命。对于你这样的人来,就需

要长时间的学习、考验和真诚的申请。”

陈独秀的回答使朱德感到痛苦,他决定远渡重洋去法国。1922年9月初,一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登上法国邮轮,前往欧洲。此时朱德已36岁。

40多天之后,轮船到达法国马赛港,朱德和同伴们换车来到了巴黎,住进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这个商人很年轻,也健谈。他告诉朱德,一些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闹得很火热,见朱德很感兴趣,他继续说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可 he 已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回不来。见朱德有些失落,商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说:“不过我这里有他的地址。”

朱德接过纸条,如获至宝,就和孙炳文上了路。他们决定马上赶到柏林去找周恩来。

10月22日,他俩到达柏林。可人生地不熟,直到黄昏,才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阴路的一幢寓所内,找到地址上的门牌号码。

“你们找谁?”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出现在朱德面前。“我找周恩来。”朱德回答。“我就是。”年轻人微笑着说。

朱德一愣,有点不信。因为路过上海时,他见过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他以为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面前的周恩来只有20多岁。

周恩来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问道: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吗?”

朱德介绍过自己后,又指了指孙炳文,表达了他俩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习惯地侧着脸,仔细听着,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他被朱德和孙炳文不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所感动。他询问了朱德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后,表示愿意介绍他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受他们为候补党员。周恩来还给他们找了住处。

这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和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朱德按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

彭德怀:关帝庙里入党“定终身”

十大元帅中,最后一个人党的是彭德怀,入党日期为1928年4月。北伐战争时期,彭德怀和段德昌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师任职,彭德怀在一团当营长,已是共产党人的段德昌在师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个人志趣相投,成了知心朋友。一日,部队行至湖北玉泉山,两人闲步走进一座关帝庙。段德昌指着庙里供奉的关公像,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摇摇头说:“关是过去的人,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没有意思。”

段德昌有些吃惊,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德怀说得很简单:“我身为穷苦人,当然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德昌又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现在每天不都在喊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彭德怀一口气说出自

己的意见。

受过马列主义熏陶的段德昌显然不满足这样的回答:“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来斗争的。共产党员就是为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的。”

就在这次谈话不久,彭德怀请求段德昌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天,张匡到彭德怀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彭德怀内心很高兴,再三感谢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一天黄昏后,特委为彭德怀举行了入党宣誓。

林彪:在两位堂兄引导下入党

林育南、林育英都是林彪的堂哥,两人都是早期的革命者。1921年秋,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林育南为培养一批有志革命青年,于6月份写信给在老家浚新小学学习的林彪、林育黎、林春枝等人,动员他们到共进中学读书。此举得到了同在武汉的林育英的支持。林彪在共进中学学习期间,经常接触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1922年秋天,林彪因家里经济发生困难,便到武昌草席门外的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小学当代课教师。不久,林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20世纪20年代初,林育南、林育英正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林彪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国家大事、民族的前途十分关心,并成为共进中学学生运动的领袖。在此期间,他多次组织共进中学等校学生到武昌

阅马场、大东门一带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3月,他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由于林彪在武汉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25年夏,他被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全国学联七大代表,赴上海出席了学联七大会议。林彪在共进中学的表现,受到武汉党组织及两位堂哥的多次表扬。林育南、林育英认为,如再好好培养一下,林彪将来颇有前途。党组织和两位堂哥的鼓励,使林彪暗下决心:将来要像两位堂哥一样,走革命之路。

1925年秋,林彪经过在武昌共进中学4年的学习(实际是3年半)获准毕业,重返家乡。当时,他的父母亲希望他在附近找一个教书的职业,能照顾家里的生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中共组织选送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投考黄埔军校。林彪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设法说服了父母,遂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于当年冬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在入校后由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伯承:弃高官求真理入党

刘伯承是川军名将。1923年秋冬,他一直在成都治伤。后因心烦,躲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里静养。闲下来,他看了不少进步书刊。

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的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吴玉章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

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在吴玉章、杨闇公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年秋末,刘伯承同吴玉章一道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第二年年年初,他又跟吴玉章赶赴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

这一路,他觉得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他看到了群众火山爆发般的反帝浪潮,看到了共产党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有为青年……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贺龙:先接受党的命令后入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周逸群受命到贺龙部队任师政治部主任。贺龙与周逸群一见如故,他们促膝长谈,周逸群向贺龙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政策,贺龙茅塞顿开。

有一次,贺龙问周逸群:“我经过一番对比,还是觉得共产党好,我想参加共产党,不知行不行?我没有文化,只好口头申请。”周逸群一听连忙说:“党热烈欢迎你,不过要加入我们的党组织,还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希望我们并肩战斗。”贺龙深深

地点了点头。此时,中共虽暂时还没吸收贺龙入党,但已把他当作自己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点头示意:“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说道:“现在,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听,禁不住离开座椅,少有地结巴起来:“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口气完全软了:“好,我服从。”

起义军撤出南昌到达瑞金后,几个重要人物的入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汽灯将教室照得通亮,墙壁上已挂起一面党旗,前委领导们就着课桌椅随便坐下,小声交谈着,等候郭沫若、贺龙进来。郭沫若对教室里布置的一切并不陌生,神态自若,向他熟悉的每一位打着招呼。贺龙则不然,他见过比这大的阵势,那多是设在香堂祠庙里的入帮入会仪式。他曾琢磨,入个小帮小会规矩都很多、气氛森严,要入共产党这个大组织,那还不更加隆重,所以刚进门时不免有些紧张。

主持人张国焘也很严肃。按事先的约定,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贺龙由谭平山和周逸群当入党介绍人。然后请郭沫若、贺龙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张国焘领一句,他俩跟一句,仪式很快结束。

走出会场时,贺龙顿显轻松,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火。他对走在身边的张国焘浅浅一笑:“这个手续并不复杂嘛,不像加

入哥老会那么多规矩。”

陈毅:认清文学梦无法救国后入党

1919年10月,怀揣作家梦的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到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在这里,陈毅认识了蔡和森,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1月到了上海。在上海,已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找到陈毅,并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梦想。他心目中理想的作家是这样的:既信仰共产主义,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又不受组织的约束;凭着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

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代表的陈毅回到了重庆,他想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然而,四川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人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毫无结果。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

1922年春,陈毅任《新蜀报》主笔。此时,他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1922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陈毅进入北京

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他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罗荣桓:国民党叛变之时入党

1926年夏,罗荣桓到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没有被录取,他便于1926年农历十月离开广州回到家乡湖南省衡山县南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家乡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使罗荣桓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才是一条真正的解放道路。他一回家就到县城找到共产党联络员修表匠老赵。经老赵介绍,罗荣桓见到了中共衡山县委和县农协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情况、接受指示。然后他又连夜邀集积极分子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县委和县农民协会的指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

1927年三四月间,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反革命政变。当时湖南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也在暗中向革命发动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在紧靠南湾的攸县,一帮劣绅聚众劫狱,将在押的劣豪尽数放出。南湾地主罗凤梧、萧罗仙等也仿效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暗杀团”,头一个就准备拿罗荣桓开刀。当时,罗荣桓恰好接到在武汉大学的彭明晶的来信,彭明晶在信中谈到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谈到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罗荣桓为进一步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探求真理,便决定前往武汉投入更大、更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去。一个深夜,罗荣桓在萧庆云的护送下,从衡山搭轮船到长沙,然后转赴武汉。

罗荣桓到达时,武汉的局势已急转直下,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武汉也一度遭到鄂军反动

军官夏斗寅叛军的袭击。7月15日,国民党武汉政府公开叛变了革命,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在这种严峻时刻,一些对革命艰巨性并无思想准备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以及一些投机分子被吓倒,纷纷脱离革命。但就在这种严重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罗荣桓却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1927年5月,他经彭明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徐向前:苦苦思索数月后加入党组织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在黄埔,他除了刻苦学习军事外,还大量阅读了进步书籍和报刊。他积极参加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成了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被分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兼任武汉分校校长,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中有施存统、萧楚女等共产党员。陈毅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先后到这个学校工作或学习过,所以,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

徐向前周围聚集了一批共产党员,如樊炳星、杨德魁、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他们时常会聚一堂,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言语不多,他认真地倾听着,反复地比较着,苦苦地思考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谁是真正的革命党?谁在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哪种主义更能拯救中国?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徐向前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进步报

刊,以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也吸引着他。他终于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1926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加紧了分裂活动,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1927年初,蒋介石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党。徐向前面临着人生最重要的考验,他经过慎重思考,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

聂荣臻:从立志实业救国转向革命

1919年12月9日,年方20岁的聂荣臻,心怀实业救国的雄心大志,在上海登上法国游轮“凤凰”号,与其他72名热血青年结伴,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10月,聂荣臻从法国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他翻来覆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1922年6月3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表达的就是这一观点。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叶剑英:革命低潮时选择入党

叶剑英是粤军名将,在旧军队中有很多老关系,想升官不愁没门路,但他却想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他并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通电反对蒋介石,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叶剑英逃至武汉,住进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在广州时就与叶剑英见过面,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次与叶剑英相见,两人彻夜长谈,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叶剑英把自己入党的渴望和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全都倒了出来。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便将此事一口应承下来,表示将向上级反映此事。李世安这个老党员当然知道党内的规定。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便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组织里讨论他入党的问题,还是可能会产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期盼,(上转第18页)

最高法:重大腐败案件将 倒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最高法6月初发文要求,建立对本院发生的重大腐败案件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实行“一案双查”的工作机制,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又要倒查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据《新京报》)

湖北:新任国企领导人员 不再确定行政级别

湖北省委、省政府5月底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企业领导人员“去行政化”,新任企业领导人员一律不再确定行政级别。

据《楚天都市报》

准备好自己的心

杨照

许多事往往不是取决于我们去了哪里、看了什么,而在于去到看到时,我们的内在感官与记忆有多少准备。生命的丰富与否,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还不如跟自己的内在准备来得密切。

很多人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眼睛,就算到了卢浮宫,也装不进任何东西到自己的生命里。很多人没有准备好自己的耳朵,在音乐厅一样听音乐,他就不会有感动,不会有愉悦,不会有音乐冲击出来的体验。很多人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他就无法感染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兴奋、别人的快乐。活在这个世界里,不同的人会和世界发生不同的关系。

(摘自《我想遇见你的人生》)

我国50多万行政村40% 没有集中供水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6月初透露,目前,全国的行政村为556万个。据专家测算,我国40%的村庄没有集中供水。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率为35%,村庄污水处理率只有9%。

据《京华时报》

市场要变革创新

刘永好

改革开放35年,前15年是供不应求阶段,做什么都能赚钱;第二个15年叫基本平衡阶段,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就越挣钱;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初步过剩阶段,不是企业越大就越赚钱。解决之道就是变革创新,人是最佳切入口。但现在市场在00后手里,你必须年轻化。

(摘自《浦江纵横》第5期)

美研究五类长寿方法

激素长寿 美国医学研究人员对一个65岁的人每周注射三次生长激素,结果这个人的脂肪沉积消失,皮肤恢复弹性,肌肉变得有力。

低温长寿 专家指出,若能将人的体温降低二摄氏度至三点五摄氏度,人的寿命可由目前的70岁延长至150岁。

微饿长寿 研究显示,喂食很少的老鼠,其寿命比喂食很饱的同类寿命长一倍。

多病长寿 医学研究发现,人体患某些疾病痊愈后,反而增强了对该病的抵御能力。

职业长寿 乐队指挥、僧侣、画家、牧人等寿命较长。从医学和生理方面讲,写字、作画有利于改善肤质和植物神经功能,缓解精神紧张和神经功能紊乱。

(摘自《报刊荟萃》第16期)